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簡編五百種

未來的戰術

(四)

萊金等著
楊丹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立新高中圖書館



00010645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二三五編百首種

王雲五 著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未來的戰術

(四)

著等金萊
譯聲丹楊

著名界世譯漢

010645

第六章 未來戰爭對於平民和軍隊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影響

丹麥約更孫教授

一 緒論

一切有關於心理學及精神與社會科學的現象，無疑地是十分繁複而且錯綜的，很不容易根據這些科學來研究，而得到可靠的結論。對於我，如果這三種科學所定下的原則不錯，似乎同樣確當地牠們更毫無可疑地表明整個人類以及各個階級底文化，不但祇依賴人民的道德的力量和精神的品質，並且要看他們的生活底環境狀態而定。氣候的不同，食物、生活程度、公共衛生組織和經濟狀態，以及遺傳、習慣、教育水準，所有的科學知識和直接地因牠而產生的技術發展程度——這一切共同組成一個很錯綜繁的整個，以致很不容易分析每一因素的單獨的影響，而將因與果分開。一切都是交織着的，而每一因素似乎各有牠自己的重要性與效果。因此，把一次未來的大

戰（世界大戰）對於那有關的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或能的影響作一確定的和詳細的說明，差不多成為不可能。人所能辦到的祇是貢獻一點推想的理論，多少與那一切或能性相應。雖然斯賓格勒（Spengler）曾那樣說，似乎在目前還不能根據社會科學和歷史推定可靠的結論。但是，一方面這裏面所含有的繁複性和錯綜性，雖使我們不能把這些條件正確地表露，或推測牠們在某些指定環境之下將取什麼形態，別方面正是這繁複性與錯綜性強迫我們深信任何未來戰爭決不會不影響到各國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態度。正如現代戰爭必將人類事業的各方面捲入漩渦，毫無疑問牠更必深切地影響到人民的精神與心靈。軍事作戰範圍愈廣，其期間愈長，影響亦愈大而愈久。這似乎是不可以斷言的，唯一的可疑點祇是這種影響所將取的形式。戰爭對於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底影響，究竟是把牠提高或腐化；牠對於文化究竟是有益的還是破壞的？總之，我們所要知道的問題是：戰爭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如前面所說，這一問題是差不多不能用任何確定的推斷來回答的。然而，根據過去大戰中的經驗來評判，也可以作某種推測，多少與或能性相合。對於將來的預測，祇有根據過去的事實，因此，

著者將首先設法表明過去世界大戰對於有關係的各國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實際的影響，從這裏再推測未來戰爭底相類的影響應該是怎樣，以圖回答上述的問題。在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將把牠們分為戰時的影響和戰後的影響，而在這兩個時間的類目之下，第一我將分論平民與軍隊所受的影響，第二則看戰勝國和戰敗國兩方各自的情形如何。

在實地進行按照上述討論這一問題以前，我要首先簡單地指出我從以得到我的結論的材料底來源。不幸，據我的見聞所及，直到現在，出版界內尚沒有關於世界大戰中和戰後時期的廣博的道德歷史或道德的統計，因此我便不得不專賴各方面單獨的研究底記錄。這種記錄的種類實在太多，使我不能作一完全的列表，祇能舉出那些最重要的來源。首先我應提到大戰底經濟的和社會的歷史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ar) 這是一部正在被卡尼基世界和平基金團 (Carnegi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印行着的偉大著作，但是需要再經過一些時間纔能完成，除此則為各國公佈的統計表冊和各種個人研究的巨著，如武定斯基 (Woytinsky) 底世界在數字中 (Die Welt in Zahlen) 卷一——七和魯道夫斯坦梅茲 (Rudolf Steinmetz) 底

戰爭的社會學 (Die Soziologie des Kriegs)。此外我自然還應該加上許多關於世界大戰的一切一般的與特殊的問題和情況的論文小冊子，和其他出版物，這些，作為時代底歷史 (documents humains) 之底注，其中所暴露的偏見、情感和誤述愈多，其價值亦愈大。最後，我必須指出在戰後出版的無數戰爭文學，如小說與回憶錄等。不必申說，當然這些關於各國在戰時與戰後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底知識之來源必須非常審慎地和批判去察看。但是這些出版物，綜合起來，給與我們一個一般的印象，其中許多細節，雖然也許仍可懷疑或未能明知，而一般地總應該可認為正確。在以下的觀察中我將企圖描寫這個一般的印象。這些觀察分為二個主要的總綱，把戰時與戰後人民的精神的與心理的態度分別表出。最後，在結束中再加上一節專門討論未來大戰的可能的影響。

二 世界大戰中精神的景況和心理的狀態

凡曾經歷過一九一四年戰事爆發時的情形的人們，決不會忘記那時所造成的極大的騷亂。正如一個死樣寂靜的悶熱的夏天，暴風雨將要降臨之前，人的心理先呈着漸漸增加的半恐怖半

希望的懸望的感覺，那有關命運的一年底七月底和八月初，特別顯呈着不斷地增加的神經緊張，外交上的形勢每小時愈加嚴重着。空氣中似乎是充滿了電力，緊張一天一天地加甚。直到最後一分鐘，羣衆仍不信有歐洲大戰的可能，但是形勢的緊張使人不能不覺悟危險非常地嚴重，因而頃明地呈露着潛在的不安。當大家所害怕的宣戰最終成為不能否認的事實之後，牠在最初的一刻，差不多竟成爲一種慰藉。懸慮是割斷了，人們誰也不知道這來到的戰爭將延長多久，牠將是怎樣的野蠻，或那因戰爭之爆發而帶來的痛苦將到什麼地步。在各交戰國，也許特別在德國，戰事的實現似乎竟被讚爲歡迎的解救。一切普通的每日生活中所含的艱苦困難都突然被忘記了，所有的意識都集中在各個國家的政府所公布的高尚目標之上：抵抗敵人防守祖國，保護國家榮譽、自由、民主或文化；嚴重地懲罰那些破壞和平的敵人等等。這是各國的心靈上所受的極大的打擊底第一階段，以後曾被不甚確切地稱爲戰時心理作用 (war psychology)。人人都以爲那將臨的戰爭，是一種刺激的和消遣的冒險事業，從其中可以得到許多榮譽和利益，無須忍受多大的痛苦，而且最要緊的是，這一冒險很快地便會過去，所以凡是想加入其中必須趕快以免錯過機會。自然也有

些心懷疑慮的人。但是大體上所有的青年們無不切望加入前線，他們的父母也同樣地熱忱地鼓勵着他們的兒子去加入這一高尚的冒險事業。那時所發現的健康標準底顯著的進步，顯示人民底一般的生命力有觸目的增進。甚至在監獄中疾病的發生也有減少，各國似乎都一般地更加健全起來。尤其在前線的軍隊中，戰爭之增加健康的效果特別顯著。曠地的生活帶來了一種原始的安適意識，以及常常發現一種不能以別種方法解釋的愉快。從營房中的無數瑣碎的職責解放出來達到前線之後，比較上似乎免除了許多道德上的責任，這給與人們以一種獨立和自由的感覺。這種感覺與羣衆底普遍的熱忱合併起來造成一種快樂的精神的空氣，這種空氣很能表現人民中道德力量的增進（參考仲馬和愛密·戰爭底神經和心理 Dumas et Aime, Névroses et psychoses de guerre, 1918）。毛奇伯爵底有名的宣言：『戰爭引出最高尚的美德、勇敢和自制，對於責任的忠忱以及隨時的準備自我犧牲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似乎是確切地適合這種情形的，因此每日生活底平凡的唯物主義竟被最高的理想主義吞沒了。

自然這一快樂的和適意的描寫，祇表明了戰爭心理的一方面，與這一深刻的感情作用之覺

醒並行着發生了知識作用底嚴重的衰弱。這一衰弱引起對於一切各種狂想和謠傳的信任與接受，只要牠們正好與支配的希望或恐怖底感覺相協調。對於一切事件，事實或作任何正確的和公平的判斷所不可少的批判的反省，被輕信性和感情的自欺性驅逐了。人人都接受了一條定律：自己的國家無論如何是站在是與非的界限底正面的，敵人則永遠是作惡者，必須用任何代價來打倒牠。牠必須被打倒，不然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同胞以及他的國家將暴露於敵人所給與的可怕的恥辱和傷害之下。一方面，對於己國的力量和自己的領袖們的信仰和勇敢自然無疑地是戰爭心理底產物；可是別方面，恐怖、憎怒和仇恨也顯然地無可辯難地是戰爭心理的效果。在每一國家的新聞紙上事實莫不被有系統地歪曲，敵人莫不被不名譽地誣蔑，這正是各政府所容忍甚至鼓勵的。「在彭孫貝的戰時的虛偽（A. Ponsonby: *Falsehood in War-time*）中有關於這些事件的有興趣的，有證據的收集。」

因為要造成和維持戰鬪精神，那是在作戰上所必需的因而便被認為是優良和應有的，不惜利用下列的手段：第一、把戰爭的全部罪惡推於敵人身；第二、把戰爭的理由和目的理想化，越高

尚越好；第三、用各種方法加敵人以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罪惡，使敵人在己國人民心目中越可恨越好。這一切都是爲有目的的，即把己國的目標擡到天上，而激起對於敵人的仇恨和輕蔑那被推崇爲高尚的對於己國底簡單的心理崇拜，事實上不但是愛國心理也是仇恨敵人的心底產物；對於自己的同胞、文化、文明、自由、民主等底熱愛以及戰爭美德，祇有用減低道德標準爲代價纔能發展。任何行爲在平時和戰時如果施於己國的人民必被認爲是犯罪和野蠻的，假使施於敵人則成爲過分的愛國美德，而因此必須被赦免或竟被獎勵。但凡可以想像得到的方法均被利用來使人民對於敵人滿含不信任、輕蔑、暴怒和殘忍心；而任何根據真確的事實來達到公平的結論的企圖，必被目爲叛逆或竟至被懲（參照羅素的戰時的正義 Bertrand Russell: Justice in Wartime, 1916）。總之，那時倫理的價值有兩個標準，因此在己國人民中成爲美德的，到了敵人中便成爲罪惡，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阻止對於事實底不偏頗的討論。這些方法的成效愈大，人民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似乎愈滿意，而堅持作戰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得勝利的意志也愈加堅強。

然而戰爭儘管延長下去，一切迅速地結束的希望均消失，人民的心理的態度便完全變更了。到處快樂的自信力和熱忱均變為苦痛。社會的情形日漸惡劣下去，這種苦痛的心理愈加顯著，當時引起頹喪與失望。對於愛國熱忱的第一個打擊，是在人民開始聽到友人或親屬們戰死或受傷的消息的時候。這給與那一般的戰爭高尚性以一種嚴重的打擊。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打擊總祇好算是私人事件，（大都在最初的期間）在人民的心理中是被光榮化作「英雄的事業」（a deed of heroism）「英雄之死」（a hero's death）或英雄的犧牲」（a heroic self-sacrifice）。這裏的結果倒不是使戰鬪意志弱減，反是激起仇恨的感情和報復的志願。直到戰爭延長下去而那不可免的麻木和頹喪發生之後，人民的態度幾有一部分的變動，雖然仍在努力用一切方法來阻止戰鬪情緒的衰亡。在平民中，和軍隊一樣，均顯呈了一種漸增的麻木性，如果不是感覺底實際地粗率化。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平民中這一變動更加容易看見。因為兵士似乎應該粗率到某程度，而且自然是會那樣的，但是同時那共同的危險在兵士中造成了一種堅強的友愛同情的感覺，有時甚至伸展到敵人方面。按照許多專家的意見，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來，這種感覺正成為兵士

的内心力量的最重要的來源，而幫助兵士們使能忍受戰場所受的痛苦和危險。然而這種友愛的精神僅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一部分表現。與牠並行着，發生了一種日漸增加的對於他人的生命之漠視，顯呈了一種自我主義的淡漠和殘忍性，以致減低了一般的道德標準。前線生活之會這樣地影響兵士是自然的形勢。無數身經戰爭者所作的報告，均完全地證明這種情形。在這裏祇須舉出一個例證：「街道上和田野上滿躺着屍身，當時是非常可怕地血肉狼藉着，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死者而動心；我們祇當牠們是沒有在那裏地前進着。一切人道的感覺都消失了。我們祇有一個意識：『前進！』」(Barbusse)顯然地，在前線是沒有給柔和的感覺和敏銳性以餘地的，而一般的情形均能使人的情感魯鈍化，否則那種生活將使人不能忍受下去。這樣魯愛生(T. Ruyssen)於一九一七年在心理學和精神評論(*Revue de Méaphysique et de Morale*)中所發表的文章，危險中的一個觀念(*An Idea in Danger*)，在裏面他普遍地論及一切人道主義的觀念(humanité-humanitarisme-humanisme)，是很應該的。戰事開始之時熱忱已經與各個國家的目的密切地連繫在一起，自然在戰爭繼續下去的時候，同情和為人設想的感覺會更加縮

入更小的圈子內，日常的舒適，甚至連每日生活的必需品，漸漸更加難以維持，人民祇得更加陷入純粹的自私的鬭爭，在這種鬭爭裏每人均不得不爲自己和家屬爭取所有的一點物品之一部分。戰爭末期中，掠取財產的案件之顯著地增加，即是這個趨勢底觸目的證明。這種趨勢更以另一形式表現。在一切交戰國中人民所呈露的不能滿足的對於娛樂和消遣底追求，也正是那很大的情感上的傷痕和日常生活之困苦底反動。鮑姆卡登（Otto Baumgarten）所敍述的德國人民感覺粗率化的情形，在其他國家中也未嘗不是一樣，雖然也許沒有那樣地猖暴。

「從戰爭得到使人情發生深刻化和簡單化的效果底希望，已因企圖譏笑他人的困苦和艱難而喪失了。當前此所習的生活方法，因食物封鎖的原因，祇餘少數人尙能够享受的時候。這一形態與目前形勢之可怕的嚴重性相對照，結果產生了情感的粗率化，這一粗率化更轉而引起麻木的放任態度。因供給自己與家屬的生活之需要便產生了無理性的搶奪，這祇能認爲是平凡無奇的，因爲很少人能抵抗這種誘惑。這種行爲不可免地對於那種視他人有同樣的權利和更大的困難底優良的推己及人的情感有不良的影響」（Der sittliche Zustand des deutschen Volkes

unter dem Einflusse des Krieges, 1927)。

關於這可以把那性事件上的完全反常的情形舉出作為一般的徵象。不錯，即在戰前已有趨於較大的性的自由底切實的傾向。但是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這一問題，誰也不能否認在戰時這一傾向之發展更快得多而有時竟流入荒淫。長期的離開家庭使兵士們常常嫖娼，比較平時不知多若干倍，而那獨守空閨的妻在長時間中亦每不能抵抗誘惑。其結果是習俗的道德標準大大的減低，而因一般的住宅之缺乏危險性也更增加。平常的家庭生活多少均被完全地打碎了，而不顧一切地去滿足過度估計的願望日漸成為不足為奇的事件。同時因食物之日益缺乏和衛生狀況之不良，亦使人的道德的抵抗力弱減。要之，一方面道德和心理狀態與別方面社會情形和衛生狀況之間的密切關係，顯然地呈露在我們面前。似乎戰爭不但需要消耗鉅量的物質資源以致人羣的每日生活所需均因而犧牲，而且牠所吸取的精神力量更多，以致差不多沒有什麼遺留着來維持後方平民底道德標準；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上述的物質與精神底相互依賴性：當物質上的痛苦日漸增加，人民的精神上亦大受損失，直到最後他們陷入無生氣的疲倦，認戰爭為命運所預

定的不可免的災亂，這種災亂他們不得不經歷千辛萬苦去忍受，因為他們除了戰鬥到底之外毫無他法。

最後休戰之給與雙方以安慰而被歡迎，自然無足驚異。這使牠們感覺一件重大的壓迫已經除去，前此和平時期的常態生活將重復降臨，而因戰爭受到的鉅傷將漸就平復。然而，正如大家已經知道的，這些深信不疑的希望是不能實現的了。相反地，各個筋疲力盡的國家中並沒有再建設，物質上與精神上均沒有再造，反之，戰爭所釋放出來的惡勢力從此方開始使人們感到牠的影響。直到這時候大戰中所種惡因方開始結果。這不但祇涉及戰敗國，即勝利者亦不能免除其影響。可是，因為戰敗國所生的反應更為嚴重，後面我們將把兩者的情形分別討論。

三 戰後時期中精神的景況和心理的狀態

人類從來沒有受過像大戰之後那樣痛苦的失望，因為所有期望於和平的救濟，完全被證明為虛假。中國各國曾誠心地信仰威爾遜總統和他的十四要點。牠們希望著，雖然牠們免不了擔負那一切嚴厲的和重大的條件，牠們的地位將不至於十分無望，牠們一定能漸漸地療治牠們的傷

痕，恢復牠們的力量。別方面各協約國則深信牠們的勝利能帶給牠們以極大部分的勝利者應享的幸福。但是不久便立刻明白地呈露出來，這兩方面都是同樣完全地錯誤，而且自然是失敗者先發現牠們的失望。我的任務並不是來描寫這些國家內部的混亂的政治形勢，但是在這裏我仍需要把牠們提出來，因為牠們是所有社會的和經濟的組織之一般的崩潰底產物，和公衆心理底奇怪的不安定之結果，這種不安定的心理是戰後所發生的諸危機時期底特徵。

在一個缺乏給養、住宅、金錢，以及任何生活必需品都極難找到的國家，顯然地大隊士兵的復員（Demobilization）祇能引起非常紊亂的狀態。同時，很有充分理由地，人民開始詢問那到處宣傳的高尚目的，那要求最大的犧牲，而因為這要求人民會無條件地供給一切的高尚目的，牠最後究竟給與了人民一些什麼東西？這使一切事物更加陷入惡劣的狀況。除此以外，更加上領袖人才之整個的缺乏，那些高聲宣傳這些高尚目的的大人物現在都寂靜無聲地設法藏躲起來，其不可避免的結果乃造成到處的失望與紊亂。那些被克服的中國國家，自己覺得變成無保護的犧牲，被神人所棄而陷入那無理性的敵人掌握之中。牠們所受的嚴厲的懲戒和罰款，似乎是與牠們的被假

定的罪惡不相稱的，而且簡直不能擔受。牠們覺得自己是被欺騙，被出賣了，而且正當那可以有利地引導牠們得到一種了解的時候，都在牠們身上更推上道德的罪名以作為勝利者底不可能的，要求底根據，因此那機會遂完全失去。似乎牠們所已受着的飢餓和痛苦還不够似的，這些被克服的國家更被加上污蔑的符印，被奴視，被嘲笑，而從這種無望的狀況之下牠們似乎竟無可逃避的餘地。當人的勞動底果實早已被預定歸入勝利者的掌握的時候，誰還想要努力呢？這種一般的失望之會把各階級的人們驅入追求無限制的荒淫以忘卻一切是不值驚異的。有一時期中道德的標準陷落到更低。除了自求生存與令人生存之外，牠們還有什麼選擇？這一杯的苦水是必須飲盡最後一滴的，牠們毫無別條道路，牠們對於以後的安樂日底希望祇是空洞的幻想了。

因為要簡括地表明那時形勢底嚴重性，我想着重以下幾點。在那些普通認為是代表現代文化化的上層和中層階級內，生活程度是一貫地下落。在一九二二年，無數這種家庭均生活在戰前生活率底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以下。生活的需要使他們不得不減少家中的房屋間數，以至普通一家中除每人必需的住室之外，祇有一間為共同日常生活之需。冬日因為缺乏煤炭，多數的房屋

均不能生火取暖。他們所有的衣服大半是戰前遺留下來的，家中的用品除萬不得已外均不能購置。食物的缺乏更加嚴重。每星期祇有一次食肉，至多或到兩次。牛乳祇能勉供幼兒的食用；奶油、糖、鮮果、葡萄酒、雞蛋和咖啡更完全沒有，而且甚至連備辦這點可憐的生活品都必須動用積疊的資產。一九二二年秋季，桑巴德（Werner Sombart）在他的著作中寫着，在他所認識的友人中，沒有一個未曾開始出售他的傢具。以後一年中情形更加變為惡劣。在這種情形之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說的話，「德國和奧大利的有教育階級退化到無產階級底水平」，實不能算是過分。比較起來自然是中層階級所受的痛苦最厲害，但是在勞動階級中情形也是同樣的惡劣，特別是熟練工人，因為那些工資較高的人們在工資標準化的強迫的緊急政策之下，受苦最深。無疑地，農民受苦最少，因為他們是自給的，他們能免除飢餓的危險，而且因為在膨脹的時期投機得利，甚至能償還他們的債務。但是再過不久，連他們也不免受影響。總之，社會沒有一階級比戰前較好，而且相反地，大多數人民多少均貧困化，祇有在少數單獨的情形中，其景況尚不比戰前差得太多。作為這種情況底典型的指示我可以提出那自殺的人數。這在戰期中因為神經底高度緊張，

會大為減少，而在戰後就突然增加，根本原因即由於那一般地不穩定和不景氣狀態（參考荷爾布瓦赫，自殺的原因（M. Halbwachs: *Les causes du suicide 1930*）。但是生活標準之退化，在牠對於人民的一般的健康狀況之惡影響上，更顯明地和嚴重地自行表現出來。關於這，德國衛生部長柏姆博士（Dr. F. Bumm）曾說：

『一切醫師們都同意以為惡劣的食物，營養不足和飢餓引起了疾病的蔓延，並且常有多次竟阻礙病症底痊愈或延緩復元的期間，而增高死亡率。許多專家均稱直到現在（一九二八年）尚不能確切地估計那戰後餘生者在體格的健全上所受的影響到什麼地步，因為戰時和戰後產生的小兒也受有很大的影響。按照他們的意見大戰中德國人民健康上的損失大都由於食物之缺乏。』（*Deutschlands Gesundheitsverhältnisse unter dem Einfluss des Weltkrieges*, I-II, 1928.）

營養不足漸漸使人元氣損傷，身體衰弱，其典型的徵象是肺病的蔓延。因肺病而死的人數在一九一三年每萬人為十四·二，至一九一八年則昇為二三。但這是肺病死亡率的最高峯，以後便

漸減少，至一九二三為十五·一。

以上簡略敍述的這種經濟形勢和健康標準的嚴重的變遷是人人所習知的，不用說牠們對於人民的心理態度和精神上有不可免的重大的影響。因為隨時隨地都可以證明體力的衰弱必引起道德的抵抗力之相應的弱減，正和貧困特別在從前曾經歷過舒適的生活的人們羣中，對於人的品格在各方面必有惡劣的影響一般。因膨脹而發生的兩種惡果，住宅的問題和失業的危機所造成的有害的影響，完全證明了上述的推斷。除此以外幼年的兒童因為在戰期未曾受到正當的教誨和訓育，竟流浪放蕩，無所不為，有時甚至作犯罪的事件。

「到戰爭的末期，大多數的父親都從軍在前線或遠離家庭；母親們不能管束兒童，於是他們遂任性流蕩。這種惡劣的現象，因為學校教室缺乏，教員名額減少，兒童的課程縮短而無人管束，愈趨愈下。因此未成年的兒童終日無事可為，閒遊嬉戲，常時不能抵抗各種誘惑而犯竊盜的行為，」（鮑姆卡登）

除此以外，母親們因為生活的原因每不得不遠離家庭以求餬口，在那裏她們接觸着與平日

家庭大不相同的環境，遭遇着她們所從未經歷的生活標準，因之重大地變更了她們的心理狀態。這也增加了一般的道德紊亂。還有一個因素是二十歲至四十歲年齡之內兩性的人口分配之大不平衡，這對於一般的性生活上有極深刻的影响。男子與女子之比率因戰事之死亡發生很大的差異。一九二〇的統計如下：

年齡	每千男子中女子的人數
二〇至二五	二五九〇
二十五至三〇	一九四四
三〇至四〇	一三八〇

還有一件指明道德的墮落狀態的是犯罪案件之增加。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三年期間每年德國犯罪人數與違反法律的人數之比較有如下表：

(以每千計)

一九一三	五六一·八
一九一四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四六〇·九

一九一五	四二五·六	一九一六	三一四·三
一九一七	三五七·八	一九一八	四〇六·一
一九一九	四〇二·四	一九二一	四七三·二
一九二三	九五四·八		

這些數字表明戰爭對於犯罪有很好的影響。但是這一好影響的代價是在戰後犯罪案件的大增。而且不但在戰敗國如此，即戰勝者亦正相同，雖然也許其程度略差，在這裏我要用幾句話來加以說明。

人人都知道戰後兵士的復員在每一國家中都引起紛擾，因為簡直不能突然地為數千百萬退伍兵士供給職業。而且在勝利的國家中所遭的困難比戰敗國還要嚴重，因為戰事賠款的償付（the payment of war indemnities）和因膨脹而生的危機嚴重地擾亂了經濟制度。在許多國家內每年失業人數均不斷地增加。牠們起初本來預備利用勝利完全犧牲中國各國來改造歐洲，但是後來牠們便發現這顯然地不是那樣容易辦到的事。雖然牠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情形尚

不致像中歐各國那樣紊亂，但不久牠們便明白那些根據勝利而幻想可以得到的希望將不能實現。其結果是那休戰條約在各處所引起的歡欣與安慰，漸漸被不滿意的心理所代替，首先政客們企圖把這種不滿意轉向到以戰敗國為出氣孔。在開始他們是成功的，但是時間飛流過去，仍然沒有可見的進步，而戰債 (war debts) 問題，被提起用較合理的觀點來考慮。當事實顯然地表明不能叫那些戰敗國單獨地來擔負重新建設的代價之後，各勝利國的人民對於他們的領袖和所被允許的利益，也便失去了信仰。在這裏他們也覺得是被騙和被賣，不全是被敵人而大半是還被他們的同胞。在這裏，道德標準也同樣地低落，而同樣的徵象也都發現：自殺的數字增加；犯罪人數增多；人們的責任心喪失，對於娛樂的要求增大；家庭生活破碎；生產率降低以及性生活上較大的自由。事實是那些破壞的勢力——貧困、住宅的缺乏和失業——在戰勝國中也和在失敗國內一樣地工作着，而簡直不能臨時湊出實際的辦法來改進一切形勢和恢復統一性。對於宗教和人道主義理想的信仰削弱了，人人都更加趨於追求每日生活的物質方面。總之，我們可以說在戰後期內發生了一種反對戰爭，反對那『最高的集體努力』(supreme collective effort) (註) 的強烈的

反動。這所謂『最高的集體努力』以最高尚的個人對於高尚理想的忠誠心，在最嚴格的組織下開始，結果則終歸在對於那所能獲得的一點事物底失望不滿意和厭棄之下消失了。這正是世界大戰對於那些有關的各國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底影響。沒有人能說這一普遍的危機狀態何時和怎樣纔能結束，因為目前的形勢似乎是這樣不能確定，以致沒有可靠的指示能使我們知道未來的時期將把什麼帶給我們。目前有許多勢力在進行改造着歐洲，牠們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但是至少有三件潛在的因素在那裏抵消這些勢力的努力。牠們比較上的重要性更大，牠們能使事態更趨惡劣，而且在某種情形之下甚至可以引起戰事的重新爆發。牠們是不觸目地在工作着，使人們不能日日密切地察看牠們的行動，這更加增加牠們的危險性。這三個因素是：一大戰中被捲入各國人力資源底生理上的退步，這是由於戰時的無選擇而造成的效果至今尚不顯著；二、歐洲各國國債額之增加，這是因大戰而起的，從經濟的觀念看來很適當地被稱為『歐羅巴的災禍』(The scourge of Europe) 柏契教授 (Prof. L. V. Birch)；三、向外膨脹的需要，

是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密切連繫的，經驗證明牠不可避免地引起帝國主義的和侵略主義的國外政策和國內的日漸增加的政治緊張狀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我們能否對下列的疑問作一答覆：我們能否掃除這些因素或至少把牠們控制，或者我們仍靜坐着等待那整個建築物到了基礎完全被蛀蝕的時候，突然崩潰下來？歐洲各國究竟能否聯合起來進行以合作為基礎的再建設，或者牠們仍將放任一切事物，取自然的趨勢，等到形勢變成那樣複雜和嚴重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新爆發？我個人的意見，以為現在為期太早，尚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是對於未來戰爭的可能的影響，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以建立回答這一問題底必需的基礎，也許是不無幫助的。為了這一理由，我將繼續描寫一次新世界大戰，大概將怎樣影響人民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

四 新世界大戰對於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影響

如果我們要利用過去世界大戰的經驗，為研究未來世界大戰對於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可能影響的基礎，必須先決定究竟是否應該認過去世界大戰為例外，或者，按照牠的一般的特徵，牠可以作為未來戰爭底典型？首先，我們必須知道過去世界大戰極大的損失主要地是由

於戰期之延長，作戰規模之浩大，以及戰術的類型。這樣，首先發生的問題是，未來戰爭在規模上，和期間上是否將與世界大戰相類？斯坦梅茲和其他人們以為不會。他的理由是：世界大戰這樣的軍事爭執，祇在某些一定的條件之下纔有可能，這種條件是不見得會很容易地再發現的。他更以為戰爭的期間將縮短，並且比較上損失將較輕，因為所用的武器更為猛烈致命，每次單獨的戰事中損失則極大。我的意見以為他的第一個理由是不充分的，雖然某些特別的政治條件之匯合，與世界大戰以前相類的不見得會重行發生，但不見得因此第二次大戰的危險便消滅。雖然現在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制度之建立作為維持和平的因素，其重要性常被重視；但是這種制度必須包括整個世界，至少其中大部分，纔能成為和平的保證。我的意見以為即是這種制度之建立，正指示我們將來的戰爭將比世界大戰的範圍更大而不會較小，而戰事之爆發究竟能否被預先防止，完全是另一問題。自然局部地方戰事之發生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以為在將來必較直到現在更難使戰爭限於局部，正因目前沒有任何國際的組織能實在地包括全世界。這些組織正在不斷地以一些大的單位聯合起來，但是無人能够預測牠們究竟能否，以及到何時方能完全合併起來。

除非這種合併能完全成功，似乎這些國際的組織之發展，如上所述不但很少限制大戰爭的範圍的可能，反而將引起比世界大戰範圍更大的戰事。但是因為在這些路線上的發展所依賴的政治的和其他因素太多，而且牠們是不能預見的，所以在這一點上要表示含有某種程度的準確性的確定的意見差不多不可能。因此我便進到斯坦梅茲的第二個理由，即武器愈猛，單獨的戰事中損失愈重，戰爭必定愈短。這一假定似乎是很有入耳的，因為單獨的戰事中損失愈大，後備人力之消耗愈速，人民道德上的力量將耗盡，戰鬥到底的意志亦將減弱。但是這一假定並不一定永遠與事實吻合，並且和大戰的經驗矛盾。在大戰中，交戰國並限於使用舊式的，但在那時尚適用的武器，牠們不知發明了多少既新而又猛烈致命的破壞工具，如飛機、飛艇、唐克車、毒瓦斯、潛艇等。其被研究和使用的規模正是前所未聞的。正是這些武器之使用，牠纔確定地開始變更戰事的性質。這一變更在過去大戰中未曾被全部實現，其理由祇因為在這些新軍械尚未被在戰爭中完全應用以前，戰事已經結束。在將來戰爭中，交戰國的軍事當局決不會遲疑着不將這些戰具儘量充分應用，而且或許還要加上其他業已發明但被嚴守秘密的，或尚須等待發明的新式戰具。祇要回想到在一

九一四年五月至一九一八年五月的期間，德國共總祇用過十二架徐柏林飛艇和一百二十八架飛機去襲擊倫敦（根據哈脫上尉 Captain Liddell Hart 的統計）而這些所造成損害已有二二四次火災，一七四所房屋完全被毀，六一七所受了嚴重的破壞，則同時在增加的將來空軍對於人口稠密的城市舉行襲擊其破壞的惡果將為何如。很可能地一切戰具所將造成的破壞，將與盧登道夫將軍（General Emil Lüdendorff）在他的小冊子《世界大戰的恐怖》（Weltkrieg droht）中所描繪的規模相等：

『在勸員當日的夜間，空中和海上戰事將立即發生……陸軍作戰在歐洲將於第一瞬間以初步的兇焰開始……在各處地方從第一瞬間起戰事將以前此所未曾見聞的野蠻性在陸上，空中和海面爆發，對於國際公法那在上次曾被敵人竭力利用的東西，將比上次的世界大戰更加不被注意。一切關於戰術的條約，如禁止從飛機上拋擲毒瓦斯，和限制潛艇的使用等，必被漠視。按照列強的相同的志願，戰爭將能完全達到的工作，毀壞無數人類生命，毫無仁慈地打破歐洲國家的意志，使牠們可以最後完全地屈服聽命於戰勝者。』

瑞典白拉特少校(Staff-Major K. A. Bratt)曾根據無數歐美軍事專家的各種意見著書名將來的戰爭(Kampen om Folken)，在那裏面他完全同意於魯登道夫的推測。他說：「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環境之下第二次大戰爆發於歐洲，這一大戰將比以前所有的更加可怕。」

這類的推測真是不勝枚舉，而且從來未曾聽見人們對於牠們表示任何懷疑。根據這大多數的意見，我以為新的世界大戰其野蠻和強烈，大概必較過去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超過多倍。而且關於這方面尤須特別注意的是：在將來的戰爭中，不但將祇對交戰的軍隊施作戰行動，而且必要有意地和特別著重地施攻擊於平民，以打破他們的戰鬪意志，這是毫無可疑的。空軍在這一用途上似乎是最合式的，因為有效地保護大城市人口集中區免受空襲之害，簡直差不多完全不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新的大戰對於那捲入的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影響將為何如？

首先，我們假定，人民在猛烈的戰爭狂熱心理的影響之下，預備挺然冒犯戰爭的危險。別方面，無疑地各國政府，在決定開戰之後，必竭盡能力煽動人民的戰鬪狂以應付作戰的需要，而且牠們

必能成功。為施行這種煽惑，牠們除了在過去大戰中業已普遍地應用過的一切宣傳工具之外，更增添了一種最有效的工具。這是無線電，牠是最重要的傳播新聞的工具之一，而牠完全是在各政府的掌握中。利用牠，可以比較任何其他方法更迅速地使人民接受一切宣傳品和煽惑的影響。雖然現在的人民大都更明晰地知道在現代式戰爭之下，他們自己所將受的重大的危險，可是在羣衆被煽惑之後，這一個事實不但不會阻止而且將鼓勵戰事之發生；因為他們恐怕自己將成為敵方攻擊的犧牲品，必反而努力先發制人以壓倒敵方。政府們如果要使人民深信一切勝利都依靠開始數次戰事的效果，是非常容易辦到的事情。別方面，對於敵人想以談判一切爭端的方法遷延時間，必定很難達到目的，因為雙方必定互相猜忌，而一方面的背信將使那突然被襲的國家遭受致命的損失。因為這一原因，如果國際的形勢一旦尖銳化，將來的嚴重的政治爭論必較以前更為嚴重。因此，在將來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努力設法避免任何爭端之成為尖銳化。

但是我的任務並不是在這篇文章中討論防止未來戰爭的最適當的方法。我所要做的祇是描寫這種戰爭，對被捲入的人民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影響。現在讓我們來看那究竟將如何。如

果戰爭在戰鬪心理底影響之下，雙方必立刻開始用空軍轟炸敵人的重要城市、工業中心和交通路線。戰爭底這一面目將造成極大的恐慌，其特徵為極端的野蠻性。一切道德的原則，一切教育和紀律必被忘記。在被攻擊的區域中，每一個人必祇有一個觀念——不惜任何代價以拯救自己和他的家屬。自我保全的直覺，將自動地逐出一切其他情感，而人類的存在將退化為無邊的紛擾。在這種環境之內，那些有高尚的道德意識的人們，將能表現他們的特殊的自制力，勇敢和不自私。但是除了這種少數的高尚精神以外，我們祇能預料整個的道德破產，因為人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聖人亦不是英雄，而用少數來評判多數將為一種嚴重的錯誤。期望平凡的人們能忍受這種嚴厲的神經極度緊張是不可能的，他們大都將受直覺的支配，發生極大的恐慌。在一般的紊亂狀態中，單獨的英雄主義的和自我犧牲的行為將毫無效用而消失於紛擾之中。也許這樣發生的組織崩潰將使戰爭之立即結束成為必要，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所造成的損失，也許將祇限於戰事底實際的直接損害。然而，似乎是可能的那一般的恐慌將引起內部的鬭爭，人各為己而戰，其結果在短期內革命和內戰竟至發生，其所取的途徑將不能預料，但是無疑的其影響必定是非常不幸的。

包括一般的道德墮落、社會崩潰、財產破壞，直到某種方法被發現來恢復和平與秩序為止。還有一個可能性是那般政府也許能够控制第一次攻擊所造成的恐慌，或阻止牠的蔓延。那麼戰爭將進入第二期，在其時所有可能的工具將都被利用，如盧登道夫所述。正規軍隊將在陸上、海上和空中作戰，造成一般的毀滅。這種作戰將延長多久無人能預料。如斯坦梅茲所指出的，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中，被捲入的各國顯現一種令人不能相信的抵抗力和精神力，我們也許可以假定在將來的大戰中，設使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經濟的和社會的情形已有進步，歐洲各國將表現同樣的抵抗能力。但是這一適應環境的能力，雖然在其他事件中有極大的價值，在戰爭中則將生惡劣的影響，因為牠將延長戰爭的期間。正是這樣，戰爭將無慈悲地進行着，行使牠在過去世界大戰中已讓我們充分認識的破壞力，而且甚至比那還要浩大。祇有一方能迅速地戰敗他方，纔能減輕雙方所將受的損失，這種損失將需經過長時間纔能補救。但是迅速地結束戰爭是很不可能的，因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用適當的方法使全部平民陷入極端恐怖狀態，以致他們的恐慌差不多鄰近瘋狂的地步，而失去任何自制力。總之，似乎最有效的迅速地結束戰爭的方法，祇有集

中攻擊於平民用所有的最可怕的武器去屠殺他們。同時，由此而生的普遍的恐慌和內戰底危險將按正比例地增大，因之這種類型的戰術或將使形勢更為嚴重。

而且，以上所述的情形將不僅適用於戰敗國。戰勝者也未必能够避免空中攻擊底可怕的效果，因為現代軍械已使攻擊比較上更容易，而防禦更困難。因此，在一切有關的國家中，軍事作戰大概將普遍地在前線以後進行。這種作戰無論在什麼地方將造成同樣的平民中的恐慌，以及那不可免地繼續而來的同樣的紛擾狀態。在處處地方社會秩序和一切各種組織將被破壞，而且很可能地即使軍事結束，也未必定即能引到內部安定底恢復。似乎更可能地將再發生暴動，革命和破壞，等到一般的疲憊和厭煩達到那樣大的程度，以致個人間、集體間和階級間的戰鬥不能再進行下去。

批評的反省能使人感覺即在現代的一切情形之下，局勢將與上不同嗎？難道人還要想像未來戰爭將有一種使人高尚的效能，能够把個人和國家中的優點均提高嗎？現在還有任何重要的理由使人相信一次新的戰爭將能鞏固人們的意志，析清人們的思想，促進對於公道底寶貴和人

道的感覺，以及教訓人們怎樣生活嗎？人還能够希望戰爭將帶來精神上的治療和提高道德標準，而在某些事件上促進文明底確定的進步嗎？

以前的敘述已經給過這些問題以消極的答覆。作為結論，我將讓研究這些問題的人自己去回答，讓他們看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所已經給與我們的經驗之後，他們的答覆是否將與我在前面所說的根本不同。如果我的觀察被接受，我希望一切他們的地位能够影響將來事件之途徑的人們，將盡他們的力量，即使用很質樸的方法，使牠們實現。

第七章 現代戰爭與人口統計之影響

瑞士赫許教授

一 勝利者和失敗者

戰爭是殺人的。現代的戰爭造成受打擊各國底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之整個的崩潰。以後牠更深刻地影響到人口的數量，牠的組成和牠的動變。在現在西歐的情形之下，當人口底自然的「常態的」增加，因每年生產率之銳降而減少着的時候，戰爭底這一效果，即不作任何人道主義立場的考慮，仍有特別的興趣。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人口變動上，不比其他國地，勝利國與戰敗國是沒有分別的。戰爭勝敗影響對於人口變動結果的影響，應該比牠所造成的一切「幸運的」和不幸的效果更為重要而受注意。在這一方面，勝利者與失敗者差不多毫無差別。國家在其他方面，雖或因這兩種不同的

戰爭結果而會發生不同的影響，但在人口統計上，因此而受的影響尚遠不及因平常一般的社會情形，特別是此國常態的人口變動形態。比如，法國雖然在世界大戰中得到勝利，但是因為牠的人口在戰前早已成為差不多完全固定無增減的，所以在戰後其本土人口統計竟落到從一八六六年以來最低的數字，雖然牠收回了亞爾薩斯羅蘭 (Alsace-Lorraine) 兩省，關於人數上，法國的法蘭西人竟退回到六十年前的情形。沒有其他國家曾遭受這樣的災難。^(註一) 塞比亞，雖然也在大戰後算是勝利的，可是牠在戰中人口的損失比較上最大。德國在戰時曾受到殘酷的封鎖而終於戰敗，其非戰鬪人口底死亡率因之有極大的增加，比常態的死亡人數多至七十五萬人；但是仍不及在意大利所見的同樣人口底死亡數字之增加——一百萬，而後者卻也是戰勝國之一。^(註二) 布加利亞，牠在戰後不但失敗而且領土也被削減，然而戰後牠的生產率底增進，卻比其他任何西歐國家更為迅速如此之例，實不勝枚舉。

(註一) 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 (La Mortalità Causata dall' in Guerre Mondiali) 而八九。

(註二) 同右，頁九八——一〇一。

從人口統計的觀念上，勝利者與失敗者是在同一平面的。牠們中間如果有任何差異這一差異也是次要的。因此我們分定戰爭在人口統計上的影響底等類，將不按照各交戰國軍事上的命運，而根據各個人口變動的特徵本身。一方面我們將察看現代戰爭對於人口底自然的變動之影響，特別是關於死亡率、生產率和婚姻率。別方面我們將更看人口數量上和組成上的影響。

二 戰爭之人口變動期牠的階段關於十九世紀諸戰爭的事實

關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一切戰爭，以及在一切有人口統計的國內，都曾發現戰爭無論在甚麼地方必引起人口底自然變動——死亡、生產和婚姻——之深刻的擾亂。而且在每一國家，於每次大戰爭之後，必定發現人口變動之劇烈的擾亂。我們會把這種時期，即人口變動離開了牠的常態的標準的時期，稱為戰爭的人口變動期。這一戰爭的人口變動期之延長期間，在各個國家，在各個戰爭，甚至在各個不同的人口變動現象之下，均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戰爭中，這種被擾亂的人口變動期必延長到戰事結束數年之後。甚至即在一個戰爭的人口變動期內，人也可以分出兩個對立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可稱為破壞的，在此階段中死亡率陡然地

增加，而生產率和婚姻率則比平常時期大為墜落。第二個我們每稱為復元階段，在這裏面死亡率迅速地下落，甚至跌至戰前的水平之下；而生產率和婚姻率則特別地上昇，當時超過「常態的」水平之上。以下是幾個過去的例證：

關於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之事實如下：

(a) 每千人口中之死亡人數

年 份	奧 地 利(僅包括公民)	普 蘭 士
一八六四——六五	三〇·三	二六·九
一八六六	四〇·八	三四·一
一八六七	二九·四	二五·八
一八六八	二八·七	二七·四
一八六九	二九·〇	二六·一

(b) 每千人口中之新生人數

一八六五——六六

三七·九

三九·三

一八六七

三六·八

三七·一

一八六八

三八·一

三六·九

一八六九

三九·六

三七·九

一八七〇

三九·八

三八·三

(c) 每千人口中之新婚人數

一八六四——六五

一六·一

一七·七

一八六六

一三·〇

一五·六

一八六七

一九·四

一八·六

一八六八

一八·四

一七·七

一八六九

二〇·八

一七·九

關於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其統計如下（仍以每千人口計）：

(a) 死亡數

年	份	法	國	德	國
一八六八	——六九	二三·八		二七·二	
一八七〇		二八·四		二七·四	
一八七一		三五·一		二九·六	
一八七二		二二·〇		二九·〇	
一八七三		二三·三		二八·三	
一八七四		二一·四		二六·七	
一八七五		二三·〇		二七·六	
一八七六		二二·六		二六·三	

(b) 生產數

一八六九	——七〇	二五·四			
一八七一		二二·九			

三八·二
三四·五

(e) 新婚數

一八七二	二六·七	三九·五
一八七三	二六·〇	三九·七
一八七四	二六·二	四〇·一
一八七五	二五·九	四〇·六
一八七六	二六·二	四〇·九
一八六八——六九	一六·一	一八·四
一八七〇	一二·一	一五·四
一八七一	一四·五	一六·四
一八七二	一九·五	二〇·六
一八七三	一七·七	二〇·〇
一八七四	一六·六	一九·〇
一八七五	一六·四	一八·二

從以上數表，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見，戰爭在每一國家所造成關於那三種人口變動現象，與戰前水平比較的反常的狀態。同樣顯明地也可看見那戰爭所推動的非常人口變動期底兩個相連續的階級。我們還看見不但那復元時期在戰爭結束之後便開始，而且那破壞時期中已增加的死亡率的甚至延長到停戰以後，如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年戰爭以後的情形。我們如果稍加注意，當更看見關於死亡率方面，那破壞階段（即死亡率增加的階段）是特別觸目，而復元階段則仍不甚顯著。別方面，關於生產率和婚姻率則這兩個階段均非常顯明，特別是關於後者（雖然在法國生產率在復元階段中之上昇亦比較地軟弱。）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說在上表各年份中所顯呈的最高率和最低率，即為各個國家在從拿破崙時代起到歐洲大戰為止的整個期間內的最高率和最低率。

法國在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四—五），意大利戰爭（一八五九）等時期，丹麥在一八六四年戰爭以後；俄羅斯在俄土戰爭（一八七七—八）及日俄戰爭（一八〇四—五），及布加利亞在巴爾幹戰爭以後，其中都可以看見完全相類的事實，雖然其程度各有不同。以上我

們所述的雖祇是歐洲國家，大概別的地方也不會相異的。

三 大戰以後關於死亡率生產率和婚姻率的一般的細節

以上這些各個不同方面的觀察之可驚的符合性，使我們在世界大戰開始時能够預見將來牠在人口統計上的影響底某些主要路線。^(註)事實上我們所估計的影響，並不祇是完全根據前此的觀察而把牠全盤引用。因為，一方面，世界大戰底空前的延長期和猛烈性，特別地加強了破壞階段底重要性；在另一方面，過去五十年以來在平常時候已經看見西歐各國人民生產率有強烈的降落的動向，特別是二十世紀開始以來，這一動向頗減弱了復元階段在生產率方面底影響（如我們已看見的法國在一八七〇——一年戰爭中的情形，那時法國已是歐洲生產率最低的國家了）。一方面破壞的程度特別的強大，「復元」的作用因此每相對地成為不重要，不但關於死亡率，關於生產率也是如此，下面我們可以看見世界大戰時期各國關於這三種人口變動的統計

(註) 見維^勒戰時中立國家的死亡率(Vide: La Mortalite Chez les Neutres en Temps de Guerre)尤其

表，仍以每千人爲標準。（戰爭中死傷的兵士不在這些表內；以後我們將再詳察關於大戰中死亡總數的細節。）

(a) 死亡率（大戰時死亡的兵士除外）

年	份	法國(註二)	德國(註二)	英國	意大利
一九一二	一三	一七·六	一五·七	一三·六	
一九一四		一八·八	一五·五	一四·〇	
一九一五		一八·五	一五·一	一五·七	
一九一六		一七·五	一四·三	一五·七	
一九一七		一七·九	一四·四	一九·七	
一九一八		二二·〇	一六·一	一四·四	二〇·四
一九一九		一九·三	一八·九	一七·六	三三·〇
一九二〇		一七·二	一五·三	一三·七	一八·八
一九二一		一四·〇	一二·一	一八·七	一七·四

(註一)一九一四——九年的結果祇計入未被侵佔的區域，一九二〇年以後則包括法國的新領土。
 (註二)從一九一七年起，根據德國的新領域。

(b) 生產率

年 份	法 國(註一)	德 國(註二)	英 國	意 大 利
一九一三——一四	一八·四	二七·二	二三·九	三一·一
一九一五	一一·六	二〇·四	二一·九	
一九一六	九·五	一五·三	二〇·九	二四·一
一九一七	一〇·五	一三·九	一七·八	一九·五
一九一八	一二·二	一四·三	一七·七	一八·一
一九一九	一二·六	二〇·〇	一八·五	二一·四
一九二〇	二一·三	二五·九	二五·五	三一·八
一九二一	二〇·七	二五·三	二二·四	三〇·三
一九二二	一九·四	二二·八	二〇·四	三〇·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四
一九·二

二〇·九
二〇·四

一九·七
一八·八

二九·三
二八·四

(註一)同前(註二)。
(註二)同前(註二)。

(c) 婚姻率

年	份	法	國	德	國	英	國	意	大	利
一九一九		一九·二	—一三	一五·四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九一八		一九·五	四·五	一〇·二	一三·六	一五·九	一四·七			
一九一七		一九·六	六·六	八·三	八·二	一九·四	一〇·二			
一九一六		一九·七	九·七	八·三	一四·九	五·八				
一九一五		一九·八	一〇·九	九·四	一三·八	五·四				
一九一四		一九·九	二六·八	一〇·九	一五·三	六·〇				
一九一三		一九·九	二八·〇	一九·七	一九·七	一八·四				

一九二〇	三一·八	二九·〇	二〇·二	二八·〇
一九二一	二三·三	二三·六	一六·九	二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五	二三·二	一五·七	一八·四
一九二三	一八·二	一八·八	一五·二	一七·〇
一九二四	一八·二	一四·二	一五·三	一五·五
一九二五	一六·九	一五·三	—	一四·八

從上表，顯然地世界大戰也引起了一個反常的人口變動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由兩個對立的階段組成——破壞階段，其特徵為死亡率之增進和生產率與婚姻率之墜落；復元階段，其特徵為死亡人數之略微減少和生產與婚姻次數之增加。關於婚姻率這一人口變動現象，復元時期的尤為顯著。這一現象在長期以後並不呈現比較戰前下落的動向，而在與大戰結束後密結的年間，則不但比戰前的比率加高很多，而且在各國大都成為絕對的最高率，較之自有統計以來之記錄為高。同樣地，在破壞階段中婚姻率亦下降至最低的水平，比以前各國和全世界一般的記錄更低。

許多。全世界以前已發現的最低率是在愛爾蘭當一八八六至八年的大遷徙時期，八·四與八·六，這一國家是一般地被認為婚姻率最低的。在法國，以前的最低率是一八七〇年的二二·一和一八四年的一三·二，這兩個數目均較一九一四至一八等五年間為高，比諸一九一五年的四·五，則達三倍。在意大利，以前曾看見的最低率是在一八六六年，那時婚姻率下落至一一·三，然而仍倍於一九一五至一八年的數字：五·四一六·〇。在普魯士，一八七〇年間會有過最低的一四·八的記錄，可是亦比德國大戰五年中的比率為高，比一九一五至一六年統計的八·二和八·三，則高百分之七五。在英國，大戰開始時曾訂有法規，特准已結婚的男子免服軍役，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婚姻率上發現特別的增加。可是這一種人造的上升，在以上的特別利益被剝奪之後，便立即停止，而從此為始，我們也看見與其他各國相同的兩階段。然而這兩階段卻仍不及各大陸國那樣地顯著。以上四國戰前和戰後的最高婚姻率如下：法國，一八一三年為二六·四和一八七二年為一九·五，而一九二〇年為三一·八；普魯士，一八一六年為二二·九和一八七二年為二〇·六，而一九二〇年為二八·〇；英國，一八五三年為一七·九，而一九二〇年為二〇·二；意大利，一八六五

年爲一八·二，而一九二〇年爲二八·〇。

然而關於生產率則不大相同。在破壞階段中，與婚姻率一樣，所記錄的最低率也是以前所沒有的。在這裏，其下落也是以法國爲最大。法國在一九一三至一四年間的生產率已經很低，爲一八·四，而一九一六年則更祇及這數字的一半——九·五。德國一九一七年的生產率也祇有一九一三至一四年的一半：一三·九比二七·二。意大利在一九一八年爲一八·一，一九一三至一五年則爲三一·一。在英國其降落沒有以上數國那樣嚴重，但是仍很急促——一九一八年中一七·七比一九一三至一四年中二四·〇。這是關於破壞階段的。然而在復元階段的增進則非常薄弱，不錯地，因爲歐洲各國生產率迅速地下落之一般的動向，一九二〇至三年間的生產率已成爲最高點，自此以後直到現在未曾重現，也許此後竟不會再見。可是，因爲那同一動向，這些數字差不多並不比大戰前夜的已經很低的數字爲高，有些甚至還較低。在法國，生產率在戰前已極低，戰後的下落也較緩，其復元階段便密接戰後的生產率比戰前高很多，而且在一九二〇至二六年的七年間把牠維持在這一水平上，但是這一水平之「高」祇是很有限的。而且戰後大多意大利人、西班牙

人和波蘭人底徒入對於這點也必大有貢獻，因為他們的生產率比法蘭西人高很多。別方面，在其他國家，其生產率沒有像法國那樣特別低減而在目前仍呈現更強的下落動向的，這個一般的下落動向不久便蓋過了復元階段的效果。在英國，祇有一九二〇年一年中生產率曾超過戰前的水平。在意大利，於一九二〇年其生產率雖然陡漲，但並不見得比密接大戰以前的年份為高。在德國，其生產率從二十世紀開始時起已特別迅速地下落，當一九二〇年中曾上升但仍停留於一九一三至一四年的水平之下，此後更立即迅速地下落。總之，關於生產率方面，牠在現代的下落的動向使那復元階段的意義成為無足輕重。

關於死亡率，其在復元階段中的下落與常態的水平相比較一般都是很小的。在世界大戰的人口變動期中也是這樣。另一方面，在破壞階段中死亡率的突增卻特別顯著。下面我們當再回到這一事件。

四 戰爭和流行病世界大戰與流行性感冒

在戰爭的人口變動期中察見的事實需要一些解釋，讓我們來輪流地察看死亡率、生產率和

婚姻率等三個現象。

「戰爭不但直接地殺人，不但在戰場上屠滅兵士或在作戰時使兵士受傷或傳染病毒因而致死，牠間接的並在交戰國的平民羣中造成死亡率底增加，甚至連中立國都包括在內。」（註二）

這段一般的觀察有任何可驚異的地方嗎？絲毫也沒有。實在地，現代戰爭所造成的商業上的和工業上的紛擾比那最嚴重的純粹經濟性的危機更加重大。這一事實本身已足使戰爭在平民羣中造成死亡率之上昇。（註二）但是戰爭與增加的死亡率之間還有更直接的和更多類的連繫。因為戰爭永遠是與疫癟不能分離的。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除了在戰爭期內以外，嚴重的流行疫也會在各處猖獗，現在都還不免，「特別是在荒歉的時期，」可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自從有史以來，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中橫行過的疫癟，其中最可怕的必發生在戰爭的時期。這一斷定是這樣可靠，使我們可以說大戰的歷

（註一）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面三。

（註二）戰時中立國家的死亡率，面七。

史同時即是大瘟疫的歷史，而反過來說，最大的流行病的歷史也即是大戰爭的歷史。」

「戰爭以兩種方法引起疫癘，這兩種方法當時是相輔而行的：一方面牠把受有傳染病菌的人們輸入那前此從未見識過這種病症的國家（比如霍亂便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傳播到法國的）；別方面他種偶爾散見各處的傳染病，或其他流行的風土病（endemic），然在平時卻並不十分劇烈的，每被戰爭擴大為傳布各處的可怕的流行疫（epidemics），如傷寒、天花、痘瘡、痢疾等。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流行疫不但在交戰國內發現，而且會波及中立國。」

「戰爭之能把那局部的病症擴大為流行疫，及把那性質比較和緩的小病變為嚴重的疫癘，是因為牠一方面造成適宜於各種毒菌之傳播的條件，並把牠們的毒性加重，別方面使人口底個人的抵抗力減弱。在戰時一切軍隊，俘虜和避亂人民等之聚居，其中受病者每不能及早隔離，他們的衣服等不能分開，這些再加上食物與住宅之不適宜，以及在戰時不可免的過度工作和苦悶，共同在軍隊中造成傳染病的中心，漸漸擴大起來播入平民羣中，後者被傳染之後，疫癘之進展更加迅速，因為人民大都因戰爭所給與困難和痛苦而其健康大為減弱。」

「這樣，戰爭引起傳播和加重傳染疾病到可驚的地步。這種形勢造成之後，所有的各種病症之中何者特別擴大成為普遍的流行疫，便看社會的和自然的環境之歷史的條件而定。」^(註)

在這些歷史的條件之中，自然包括着我們關於防範流行疫的知識之程度，這一知識無疑地多少能抵消戰爭底造疫效果到某種程度。一國的後方經濟組織狀態也有很大的影響。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戰爭底間接的屠殺效果在過去必較現在為烈，在落後的國家比在文明發展的國家更可怕。這一推測正與我們在世界大戰中所見的事實相符合。在十九世紀諸大戰爭的時期，戰爭所造成的間接的死亡率，即在平民羣中造成的死亡率之增加，比諸直接造成的戰死人數廣大數倍。比如，奧地利在一八六六年戰爭中，其士兵們戰死、受傷和失蹤的總數，被虜者除外，大約為五萬三千名，而平民死亡之人數之增加則達二十餘萬，其原因為霍亂之流行。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德國士

(註) 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而七〇—七一除此以外可參考戰爭和流行性感冒(*La Guerre et la Grippe*)，特別

關於第二章以及赫許的歷史的和地理的毒菌學指南(A. Hirsch: Handbuch der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Pathologie)。普林金的戰爭所造成的流行疫(Prinzing: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

兵之戰死者，因傷或病在醫院中斃命，以及失蹤者估計共約四萬一千名，全國因此次戰爭而致死的人數則共為二十七萬，其中大多數由那時戰爭所造成的天花流行。同一戰爭中，法國死去士兵十萬人，而平民死亡率超過常態的類數則為六十萬。^(註) 在世界大戰中，戰爭在英國本土，法國和德國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之增加則較之戰場上直接的損失稍少，後面我們當可以看出。

『然而直到現在尚不能以怎樣的「科學」方法去執行戰爭，使人民完全不遭流行疫的危險。在世界大戰中整個現代科學曾被應用來保護軍隊和人民使不受那威脅着他們的傳染疫癥之危害。……期望那延長數年的可怕的戰爭至少在西歐各國中不造成平民羣中的廣大的瘟疫，在世界的歷史上差不多是獨特的現象。所以在大戰初期中雖尚能勉強抵抗瘟疫底侵襲，而最後那衛生的前線（那在我們看起來是真實的前線）終於崩潰。自然地，牠首先於一九一四至一五年冬季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俄國、塞比亞、波蘭和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中開始破裂，在這些國家中傷寒病表現了牠與戰爭不能脫離的關係。以後，其他各交戰國的衛生前線也完全崩潰，而一種從

來未曾經歷過的大流行疫完全摧毀了一切……這一流行疫和世界大戰本身一樣，以歷史上所未有的威力侵略了空前廣大的區域，屠滅了空前衆多的人數，不問是交戰者或中立者，兵士或平民，男人或女人，成年或幼兒，當着的一律被掃滅。牠是流行性感冒」(influenza)。(註一)

無疑地，這一流行性感冒在某一地爆發之後，和一切戰爭的流行疫一樣，必定要再擴大，用一切別的方法和媒介物擴大，而不必再依賴戰爭。可是不問這些方法和媒介物的種類怎樣多和牠們的影響怎樣大，牠在爆發和增劇的斷然的一刻間，必顯然地呈現戰爭的影響和效力，這我們在他處曾更詳細的論到。(註二) 牠是被戰艦和運送船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船隊輸入歐洲和印度的。從船上牠轉移到兵站和陸軍中，再從兵士推進到城市和鄉村的人民。

一九一八至一九年流行性感冒的毀滅的結果是不會被人忘記的。在牠最初出現的國家內，牠並沒有造最嚴重的破壞。而正是在那些衛生狀況比較落後的各國中，當牠侵入了之後，牠纔

(註一) 戰爭和流行性感冒，第二章。

(註二) 同上，除此再參考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頁七一一三。

呈顯了牠的最可怕的屠滅力。實際上，在西歐與中歐各國中，流行性感冒的最高死亡率並不是發現在英倫三島（約二十萬名，其中英格蘭佔十五萬名），也不是在德國（約四十萬名），而是在意大利（共四十三萬名，其人口總數約與法國相等）和相對地在伊比利亞半島（約二十萬名，其中西班牙佔十五萬）。（註）

然而這次流行疫所造成最大的損害並不在歐洲，而在印度，在此廣大的國家中，這由船舶（註）關於法國、英倫三島和意大利，參考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而一九一九—一〇四一五，關於其他各國和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疫的一般的情形，參看國衛生部的關於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世界疫的報告（Report on the Pandemic of Influenza）。除此再參看國際公共衛生局月報，一九二一年二月號中普特芬博士（Dr. Lottevin）的關於一九一八—一九年流行性感冒世界疫報告（Rapport sur la pandémie grippale de 1918-19, in the Bulletin Mensuel de l'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特別是「一三八和一四四」以及同月報一九一九年四月號中登載的約奇教授在是年三月中協約國衛生委員會常會席上遞呈的報告，特別關於而三七〇（Rapport présenté à la Commission sanitaire des Pays Alliés）。

戰時各小戰國的軍事檢查機關禁止登載一切關於流行疫之進展的新聞，直到流行疫侵入各中立國，特別是西班牙之後，報紙上纔能自由登載這種消息。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人們稱這次的流行疫為西班牙式流行性感冒。

運來的災害在那無數的貧民中得到了最適於繁殖的土壤，幾個月之內，到一九一八年底為止，流行性感冒在英屬印度境內殺死的人數為七百萬，在印度土著區域中則為一百五十萬。（註一）

這次流行性感冒造成的世界疫在全世界所共殺死的人數，我們將永遠不能確切地知道。大約總計起來，我們可以說在亞洲為一千萬（其中日本二十五萬，波斯二十萬，菲列賓八萬五千），（註二）歐洲為二百五十萬，美洲為一百五十萬（其中美國佔六十萬，墨西哥四十萬以上，巴西約十二萬五千）（註三）世界其他各地至少還有一百萬（其中埃及約佔十五萬以上，（註四）南非區域十四萬）（註五）這樣，其總不下一千五百萬。

（註一）參考前述英國衛生部報告，面三八三，三八五。

（註二）同上，面三七八—三八六。

（三）同上，面三二三—三四二。

（註四）普特芬博士，關於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世界疫報告，見前，面一四七。

（註五）英國衛生部報告，見前面三六四。在法國殖民地中也爆發過極嚴重的流行感冒疫，特別是在擗兵的行動之後。本書面三九二（註）中所述國際公共衛生局月報一九三〇年七月號，面六八六—七二四，法國殖民地軍訓總監

古新博士所著關於法蘭西殖民地中流行性感冒世界疫狀況報告在有些太平洋羣島中大部分人口簡直滅盡。大溪地羣島（PEI）中首都巴彼梯（Papeete）的人口有百分之二十五死於這一瘟疫。（同上月報，而七〇六。）

五 世界大戰後的他種傳染疫病

歷史上的一切大戰，各有牠的主要的流行疫：有的是鼠疫，有的是霍亂，有的是傷寒等。世界大戰則也有牠的流行性感冒。但是除了那一主要疫以外，一切大戰莫不另有牠們的附屬的流行疫。世界大戰也不是例外，而且其範圍特別更大。俄國曾遭發疹腮室扶斯、傷寒、來復熱、霍亂、天花痢疾、瘧疾、猩紅熱及其他傳染病荼毒。傷寒和發疹室扶斯滅絕了塞比亞人口的大部分，橫掃波蘭，並在奧匈國和其他地方猖獗。鼠疫橫行於印度和東印度羣島。霍亂殺死了印度、印度支那、菲列賓羣島、生尼高爾（Senegal）等地方無數的人民。在歐洲，因平常的病症而死的人數也大有增加，特別是在大戰之後，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間。限於篇幅，我們不能把這些病症一一詳細列出。（註）但是

（註）作為例證，請參考意大利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一等十年中按照死亡原因之死亡數，見著者的《世界大戰造成

我們至少應指出其中之一——結核病，特別是肺結核。大戰以前和以後，因結核病而死的人數在多數西方各國都有堅強的下落的傾向，但是在大戰中，牠突然的上升起來，不但在交戰國並在許多中立國內，雖然在後者一般的程度較為輕微些。這個上升的趨勢，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戰爭，中立國給養品在海上的輸出被嚴格統制之後，更加特別顯明而且一般化。結核病死亡率之增加是營養不足與勞動過度的直接的結果，特別在女子方面，她們被迫不得不在田地和工廠中，尤其是軍火廠中，代替男子的工作，而且特別地繁重。這樣，一九一八年的結核病死亡率比一九一三年在法國未被侵入的區域內加高百分之十；在英國和丹麥，百分之二十五；在西班牙，百分之三三；在捷克，百分之三四；在意大利，百分之四四；在荷蘭，百分之五〇。在被封鎖的各國更高——德國為百分之六一，而奧地利為百分之六七。在德國有人口一萬五千的小鎮中，一九一八年的數字竟將達一九一三年的一倍——每萬人中因結核病而死的從一五·七升至三〇·〇。(註)德國在戰中因結核病而死的人數比戰前增多十六萬，其中十四萬為平民。在這一總數中，包括士兵，有五分之三，即

(註)同上，頁五九一六〇。

九萬二千四百名爲女子（註一）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其他各國看見，雖然比例或者較小（註二）

六 一切戰爭與中立人民的死亡率

這樣，戰爭不但在戰鬪員羣中散播死亡，在平民羣中更加厲害；牠不但屠殺男子也屠殺女子；不但青年的成年人也連幼兒和老者；不但健壯的也連病弱的；在現在牠的屠殺範圍比前者更加廣大，不但在戰場上並能飛越海洋；不但在交戰國內，並且包括那與牠們有關的一切中立國。因此，現代戰爭不祇交戰國的而是全人類的事件。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十九世紀的一切戰爭均不但祇屠殺交戰國的人民並連及中立國的人民，特別地是由傳播疫癟於交戰國境外一事。現在讓我們舉出幾個例證：在一八六六年大戰的一年中，荷蘭死亡人數增多一萬一千，比國爲二萬九千；（註三）一八七〇至七一年普法戰爭中荷蘭

（註一）同上，頁六二一四。

（註二）同上，頁六一—二。

（註三）戰時中立國家的死亡率，一九一二四。

死亡人數增多四萬七千，比利時五萬五千，瑞士二萬三千（註）更進一層，在這三國中歷來人口死亡的最高率均發生於這些戰爭期內，而除比國被捲入世界大戰以外，牠們大都嚴守中立，比如荷蘭每年死亡人數祇有四次超過十萬以上，而這四次都在戰爭期內，即一八五九年，一〇三、〇六七名；一八六六年，一〇一、八五四名；一八七一年，一〇六、九七八名；及一九一八年，一一五、四四〇名。瑞士在一八六七年以前沒有全國死亡人口統計，而此後的最高死亡率則為一八七〇年，七二、八三八名。一八七一年，七七、九九八名；及一九一八年，七五·〇三四名。相類地，比國的最高死亡率是在一八六六年一五一、一一六名；一八七一年，一四五、七四六名；及一九一八年，一五七、三四〇名。在世界大戰中，因為牠的範圍更廣大，自然受到影響的中立國更多。比如瑞典一百五十年以來記錄中所有的最高死亡率發現在一九一八年，為一〇四、五九一名。挪威也與牠在同一年間達到四三、六〇三名的最高額。西班牙也不成例外，牠在同一年間得到六九五、七五八名的最高紀錄。

（註）同上。

歐洲各中立國在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增加的數字如下：（註）

挪	威	二三、二九〇人
瑞	典	四九、一九八人
丹	麥	二三、二七六人
荷	蘭	八五、七七一人
瑞	士	三一、七二五人
西	班	三七〇、九六九人
	牙	五八四、二二九人
	共計	

這樣，世界大戰僅在歐洲各中立國中已致死六十萬無辜的生命。

七 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底一般的平準表

下列的平準表大概地可以表明世界大戰在歐洲各國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直接的和間接的

（註）欲知怎樣來決定中立國人口死亡數超過平時數字的方法，參看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特別關於西五四及七五。

造成的死亡人數總額(註)

世界大戰直接地(士兵)和間接地(平民)造成的死亡人數(以千計)

(註)這張半準表中多數的數字以及怎樣決定這些數字的方法，均曾載在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一書已出版的兩篇中。其他的數字，或者另加水號，這些在不久出版的第三篇內，將被釋明。

國 別	士 兵	平 民	總數以 千計
法 蘭 西	一、三二〇	五〇〇	一、八二〇
英 國	七四四	二九二	一、〇三六
意 大 利	七〇〇	一、〇二一	一、七二二
比 利 時	四〇	九二	一、三二
塞 比 亞 及 門 第 尼 格 羅	三二五	四五〇	七七五
羅 馬 尼 亞	二五〇	四三〇	六八〇
希 臘	一〇〇	一五〇	二五〇
葡 萄 牙	八	二二〇	二二八

德意志	二,〇〇〇	* 七五八	* 二、七五八
奧匈帝國	一,二〇〇	* 二,三二〇	* 三、五二〇
布加利亞	一〇〇	* 一〇二	* 二〇二
土耳其	五〇〇	* 二五〇	* 七五〇
舊俄羅斯帝國	五、三五〇	五、〇五〇(註一)	* 一〇、四〇〇
中立各國	—	五八四	五八四
歐洲統計	一二、六三七	* 一二、二一九	* 二四、八五六
美洲	一七四(註二)	* 一、五〇〇(註三)	* 一、六七四
亞洲	六九(註四)	* 一三七〇〇(註五)	* 一三、七六九
非洲	九九(註六)	* 九〇〇(註三)	* 一〇〇〇
大洋洲	七六(註七)	* 六〇(註二)	* 一三六
總計	一三、〇五五	二八、三七九	四一、四三五

(註一)這裏面不包括一九二一年大蕭條以後的數百萬死亡人數，那次大蕭條也大都是受了戰爭的影響。

(註二)美國兵士十一萬六千人，加拿大和緬甸五萬八千人。

(註三)這些數字並不完全，我們差不多完全祇計算了流行性感冒的被害者。

(註四)英屬印度六萬四千人，日本五千人。

(註五)在這一總數中英屬印度佔一千零二十五萬人，印度土人部落佔一百五十萬人，其他各國多不完全。

(註六)法國殖民地七萬二千人，英屬南非洲白人七千，土人二萬。

(註七)澳洲五萬九千人，新西蘭一萬七千人。

這是世界大戰所造成死亡數底大概的平準表，仍然是不完全的。但已經差不多到了四千二百萬。法國意大利全國的人口尚不及此數。歐洲境內被屠滅的已達二千五百萬，比瑞典、挪威、丹麥、荷蘭和瑞士五國人口相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除歐洲以外，亞洲為最多，而尤其是印度，那出名的窮困和疫癆流行的國家。在一切國家中，英、德、法三國的本土人民間接被戰爭屠滅的都比直接陣亡和因傷或病致死的兵士額較少，但是即這三國平民死亡增加的總數也已達一百五十五萬人，而兵士死亡者則為四百零六萬五千人。在歐洲其他各國，則平民死亡人數因大戰而增加的比直接戰死的兵士為多兩者相加則歐洲全部因戰爭而死亡的平民數竟與兵士死亡數差不多相等。

如統計全世界，則平民的死亡數更超過兵士一倍以上。而且我們的平準表尚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那大都是關於平民和非歐人的。如果將這些攏統估計起來，我們大概可以說世界大戰所屠滅的平民大約不下三千萬。

科學和社會組織曾極大地增加了我們保護生命抵抗戰爭的屠滅力的方法，但是戰爭的屠滅力，卻更加擴大了牠的範圍和強烈性。因此牠所造成的毀滅，真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

八 大戰中犧牲者底年齡和性別

戰爭直接造成的死亡自然必屬於成年男子，特別是青年們。牠間接造成的則差不多平均分配於兩性之間。至關於間接被害的人們底年齡，則在十九世紀的諸戰爭中大都屬於幼年和老年人。^(註)

在十九世紀末葉中，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所以那時的兒童也最易成為戰爭所造成的不良狀況底犧牲。然而在世界大戰中各西歐國家則大不相同。二十世紀中嬰兒死亡率在各文明國已降

達歷史所從未曾有的低度。^(註)現在我們比較從前更能有效地保護幼兒抵抗疾病和死亡。因此嬰兒們便不再成為戰爭的慘酷行為底間接的犧牲品，至少沒有從前那樣厲害。在那些主要的西歐國家中，雖然世界大戰比以前所有的更廣泛，更慘酷，而平民因此而致死的比率卻相對地減少，一部分的理由也就是由於這種情形。可是，別方面，現代因戰爭而喪命的平民，其中大部分便因此而為成年男女。

九 關於世界大戰後各交戰國內婚姻率的細節再結婚的寡婦和鳏夫

戰爭對於婚姻和生產能造成一種特別的時期，也是不足為奇的。

在戰爭開始之初，青年男子之被徵集加入軍隊，必然地要使婚姻率大為減少。除此以外，戰爭所造成的一般的不穩定以及經濟的紊亂狀態，一定也要阻止或延緩許多預定的婚姻。因此婚姻

(註)在瑞士，一歲內嬰兒的死亡率之下落特別地可以令人滿意，而且差不多是不斷的。一八七六年新生嬰兒死亡數為百分之二十九·七，至一九一三年降為九·六，一九二九年更降為五·九。一八七六—一八〇〇年間瑞士有五分之一的（百分之二〇·四）嬰兒不能活滿一歲，現在則祇有二十分之一。

率底破壞階段，即其下落，必在戰爭爆發時立即開始。反之，戰爭的停止和復員，以及穩定狀態之回復，必然地將使婚姻率突銳地超越常態的水平以上。造成這種現象的有幾個原因。首先，除這一時期中常態應有的婚姻件數之外，必須加上其他因戰爭而有意地或機械地被延緩的婚姻。戰爭的期間愈久，青年達到成婚年齡而被戰爭阻止不能成婚的人數愈多，則在戰事結束之後，婚姻之上昇必愈高。也許戰爭中充滿了疲乏與冒險、痛苦與恐怖的生活狀態在人心中引起了一種反應，使人更需要一種親愛的家庭中底安靜的和有秩序的生活。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戰爭不但屠殺獨身者，並且也屠殺已婚的男人。這樣牠造成鉅額的寡婦，而且也有鳏夫，因為牠間接地造成平民中的死亡。總之牠破壞無數的家庭，造成多數可以重新結婚的男女。這些被戰爭造成的寡婦和鳏夫在戰後大都重結婚，而且多在戰爭結束後第一年。十九世紀的一切戰爭之後，歐洲各國莫不顯呈這種情形，世界大戰後尤為特著。戰前多年間德國（舊領域）每年重結婚的鳏夫和寡婦名數差不多是不變的，前者約四萬四千人，後者則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六千之間。（一九一一至一三年間每年平均實數鳏夫為四四、二四八人，寡婦為二五、七九七人。）大戰以後，數年間，德國新領域內

每年重結婚的鳏夫名數如下：一九一九年九九、六五八、一九二〇年八二、二四四、一九二一年六六、〇九一、一九二二年五八、六〇三；一九二三年五一、七七三；從一九二四年以後則降為四四、〇〇〇至四一、〇〇〇。寡婦重結婚的人數在密接休戰期第一二年尤為特大，以後仍漸漸墜落，回復原狀，如一九一九年為一〇五、七四九；一九二〇年九四、一一八、一九二一年六八、五一六；一九二二年五二、二三〇；一九二三年三八、八八五；一九二四年二八、六〇五。此後甚至落到戰前水平之下。在其他各國也可以看見完全相類的事實。如法國，其戰前每年重結婚的鳏寡人數也是不大變動的，男子數總在二萬四千名，女子約一萬八千名左右。戰後，在新領域內重婚的鳏夫人數在一九二〇年（註）昇為四八、〇六一；一九二一年三六、五五四；一九二二年三一、一四四；一九二三年二八、三七九；以後更漸漸降落；重婚寡婦數一九二〇年為六八、一五三；一九二一年為四七、二七九；一九二二年三四、九八三；一九二三年二九、五〇四；一九二四年二五、九七七；到一九二六年更降為二〇、〇七四；以後更繼續下落。從以上兩國的數字，我們可以

（註）一九一九年法國全國關於這事件的記錄不能找到。

看見在密接戰後一年中，嫁夫再結婚的人數比戰前常態的數字增加二倍，而再婚的寡婦則達四倍之多。寡婦結婚人數之這樣地突增，自然是因為戰中青年從軍的夫婿戰死極多的結果，後而在第十七節中我們當更詳細論及。戰爭人口變動期內的新婚人數中重婚嫁夫的數字和比率之增加自然是因許多青年男子之從軍，以及他們在戰場上死亡的結果。這種青年男子中以未娶者佔多數，所以嫁夫們便代替了他們的地位。

因為地位的關係，我們不能再詳細論到關於婚姻率的一切現象，如新婚配偶數中第一次結婚的和嫁寡重婚的人數之分配，以及在這種戰爭人口變動期內關於新婚男女年齡的分配，雖然這是很重要的。

十 關於世界大戰後各交戰國內生產率的細節新生嬰兒的性別

大戰期中和戰後造成婚姻率之連續的下降和上升等動變的原因，對於生產率也有同樣的影響。動員和不安定使生產率特別地低降，而復員和平之恢復，則使生產率迅速地重行上升。同時，婚姻率之下落與突昇當然也要轉而影響到生產率底相應的變動。但是，顯然地，這些因素對於

生產率之影響，必定要在一年之後方纔呈顯。這樣生產率之下落必在開戰一年之後方纔開始而其增高亦須在戰事結束後一年方纔呈現。然而如我們在第三節中曾提到的，現代一切西方國家關於這方面的特徵是生產率之不斷的顯著的下落，因此戰爭所造成的非常的急劇下降使破壞階段中的生產率達到前者沒有的水平，而在復元階段中生產率的上升則祇能略使那常態的下落遲緩，而不能把生產率有效地昇至戰前水平以上。

很早便有人說，戰爭中生產的嬰兒男性較多。有些人並以為這是神力，神把那被戰爭翻倒的兩性間之平衡重與恢復的威力之表現。人世一切罪名都是推在神身上的，戰爭尤不為例外。自然似乎神決不會反對兩性間平衡之重建。但是，我們不管這些見解究竟對不對，和其中的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特別是有人更假定戰爭中人們所受的營養不足和體力過勞，利於男性嬰兒之生產——這一事實總是真實的，在世界大戰中又被證明。不但是在戰爭期內，而且在和平重建後數年之間，新生嬰兒中男性的比女性的實較平時為多，甚至在後一階段內更為顯著。下列表格可以作為例證，其中祇包括產後生存着的嬰兒：

每千女嬰中的男嬰數

年	份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意 大 利	比 利 時
一九一〇	一四	一〇五六	一〇五四	一〇三八	一〇五二	一〇四二
一九一五		一〇五五	一〇四六	一〇四〇	一〇五〇	一〇四四
一九一六		一〇六五	一〇四九	一〇四九	一〇五四	一〇六七
一九一七		一〇六九	一〇四七	一〇四四	一〇六〇	一〇三四
一九一八		一〇七三	一〇六五	一〇四八	一〇五五	一〇五四
一九一九		一〇八〇	一〇五九	一〇六〇	一〇五七	一〇五六
一九二〇		一〇七二	一〇六二	一〇五二	一〇六〇	一〇六〇
一九二一		一〇七三	一〇四九	一〇五一	一〇五六	一〇五四
一九二二		一〇七〇	一〇四九	一〇四五	一〇五一	一〇五四
一九二三		一〇六八	一〇五三	一〇四四	一〇四五	一〇五三
一九二四		一〇六八	一〇四六	一〇四七	一〇五四	一〇四七

一九三五	一〇六二	一〇五〇	一〇四五	一〇五一	一〇四四
一九二六	一〇六〇	一〇四四	一〇四一	一〇四八	一〇四一

從上表看來，雖然在世界大戰之後，生產的男性優勢 (masculinity of birth) 亦比平時為高，可是如果認這一「恢復」兩性間平衡的動向的有任何重要性，實在是錯誤的。因為總計起來，因這一現象而增多的男性嬰兒至多祇及大戰中被屠殺的男子之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在有些地方，如意大利，尚不到這一比例。與那被戰爭造成的兩性間的極闊的懸隔比較起來，這一補充的男性優勢是無足重輕的。

十一 世界大戰後中立國的婚姻率

在前面第四節中我們已知道戰爭不但在交戰國中，並且在那與這些交戰國有密切關係的中立國內造成死亡率底增加。關於婚姻率和生產率，當然不可免地也要發生相類的影響，特別是在那些與各交戰國接壤的國家，因為牠們不得不把各自的兵力全部地和局部地動員起來以保護牠們的中立。事實完全證明這一推測毫無錯誤。在那些與各交戰國相鄰的中立國內，戰爭使婚

姻率和生產率都發生一種非常的人口變動時期。這時期與交戰國內的完全相類，也分為兩個階段：破壞階段和復元階段。這樣的現象在十九世紀各次戰爭中早已可以看見，（註）世界大戰中又重新呈現而且更顯明。

讓我們先看過去大戰中各中立國的婚姻率。和德法兩國一樣，我們在鄰近各交戰國的歐洲中立國中發現一九一五年是婚姻率最低的一年，同樣的最高的婚姻率則在一九二〇年發現。除此以外我們還看下列的幾件事實：

(a) 在鄰近各交戰國的各中立國中，戰爭也曾引起與各交戰國內相類的非常的下落和上升的雙重變動，但其變動的程度則比各交戰國小許多。

(b) 中立國與戰場愈接近，其所受的戰爭底影響愈大。在這方面中立國與交戰國相對的地理上的形勢，有重要的關係。

這樣，我們如將歐洲各中立國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所觀察得到的婚姻率（即每千

人口中新婦人數)與一九一三年的相比，我們得到如下的比較表：

國別	婚姻率	婚姻率	落實的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一四年相比的百分數
瑞士	一九一三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荷蘭	一三·八	一一·四	一〇·〇
丹麥	一五·五	二三·六	(一)一七
西班牙	一四·四	一三·八	(一)一〇
瑞士	一三·六	二三·〇	(一)一〇
西班牙	一一·八	一一·六	(一)一〇
挪威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一〇

從上表看來，瑞士因為牠四面被交戰國包圍，其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中婚姻率受到戰爭的影響特別地深刻與顯著。其次為荷蘭，除瑞士以外牠的國境差不多四面也都是交戰國而且牠與最重要的戰場相鄰近。丹麥與西班牙各處兩個主要交戰國的一面，牠們比荷蘭又略次。瑞

瑞典所受到的戰爭底破壞影響已經極小，差不多看不見，而挪威則竟不感受絲毫影響。

從一九一六年起，在西班牙和丹麥婚姻率均漸漸上升差不多回復到戰前的水平。瑞典和挪威則更超過以前的統計，而尤以挪威為最甚。至於在瑞士和荷蘭，其變動的形勢則與各交戰國十分相類，雖然不及那樣顯明。如果把第三節各交戰國的婚姻率比較表（見第三節）和下表參看，必能看見這種情形：

每千人口中新婚人數表

年 份	瑞 士	荷 蘭
一九一二——一三	一四·二	一五·四
一九一四	一一·四	一三·六
一九一五	一〇·〇	一三·三
一九一六	一一·四	一四·四
一九一七	一一·二	一四·四

一九一八	一三·四
一九一九	一五·八
一九二〇	一八·〇
一九二一	一六·八
一九二二	一五·四
一九二三	一五·一
一九二四	一四·六
一九二五	一四·七

瑞士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間的婚姻率是自來記錄中最低的，而一九一九至二〇年的數字則爲從未超過的最高額，雖然在一八七〇至七一年戰爭後曾達到差不多的比率。在荷蘭，一九一五年的最低率以前祇在一八四七年曾發現過更低的一次，而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的數字則爲從未超過的最高紀錄。專就牠們的婚姻率看起來，將以爲瑞士和荷蘭均會參加戰爭似的。

十二 世界大戰後中立國的生產率

各中立國的生產率也和婚姻率一樣，顯呈相類的變動，可是那些雖離交戰國較遠的中立國在出生率方面所受戰爭的影響卻較婚姻率更強大，至少在歐洲的各國是如此。在下表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情形：

每千人口中的新生人數

年 份	瑞 士	荷 蘭	丹 麥	西 班 牙	瑞 典	挪 威
一九一三—一四	二二·八	二八·二	二五·六	三〇·一	二三·一	二五·三
一九一五	一九·五	二六·二	二四·二	二九·八	二二·六	二三·八
一九一六	一八·七	二六·五	二四·三	二八·九	二二·一	二六·一
一九一七	一七·二	二六·〇	二三·七	二八·八	二〇·八	二五·一
一九一八	一八·四	二四·八	二四·一	二九·四	二〇·三	二四·二
一九一九	一八·四	二四·二	二二·六	二八·三	一九·六	二一·九

一九二〇	二〇·九	二八·一	二五·四	三〇·〇	二三·五	二六·三
一九二一	二〇·八	二七·四	二四·〇	三〇·四	二一·四	二四·四
一九二二	一九·六	二五·九	二二·三	三〇·五	一九·六	二三·〇
一九二三	一九·四	二六·〇	二二·五	三〇·四	一八·八	二一·七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見從一九一五年起在所有的歐洲中立國中生產率都有突然的墜落。這在荷蘭和瑞士尤為顯著。前者一九一五年的數字比一九一三至一四年下落兩點，或百分之七；後者則降落三點半，或百分之十五。這一下落的動向繼續增加，直到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在各中立國均有突然的上升，和各交戰國一樣。而且，正如多數交戰國，即在這一時期生產率也不一定比較前為高。除瑞典和挪威以外，其他各國均反而較低，瑞士則更低不少。一九二一年以後，在各國均尖銳地下落，除了西班牙，牠的常態的生產率底下落直到現在都是很輕微的。這樣，在大多數國家中，現代生產率「常態的」下落趨勢均使戰後復元階段內的增加成為非常薄弱。因此關於生產率，在各中立國內我們也可以看見與各交戰國相類的人口變動現象，不過其範圍較小而按照各

中立國底地理形勢各自不同而已。

十三 現代戰爭和人口的總額數

十九世紀中，特別在後半部，白種人數曾有非常的增加，簡直是歷史上所曾未見過的。在那一時期中歐洲人口從一八〇〇年的總數二萬萬到一九〇〇年增加一倍為四萬萬。

「換一句話說，祇在十九世紀的一百年中，歐洲人口竟增加二萬萬以上，即等於自從歐陸上以發現人類以來數十百年中生聚蕃殖而得到的總數，甚至比這總數還要多。而且這裏面尚未計及那些在十九世紀中移居他地的無量數歐人，他們帶着他們子孫移居海外各大陸和島嶼，這樣改變了地球表面自古以來人種的分配。」（註）

除法國以外，歐洲人口生產率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五年間纔開始有看得見的墜落，然而這一墜落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在歐洲尚是比較和緩的。別方面，死亡率的下降則異常迅速。因此，人口

（註）赫許，人口和罷工（Hirsch：Population et Chômage）章，見日内瓦國際勞工局出版的「一九三一年中的罷工問題」（Le Problème du Chômage en 1931）。

的自然增加是向上漲的，不但祇在絕對的數字上，而且每年每千人口中的增加比率也常常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所減少的人口總數在十九世紀中很迅速的便可以補足而且更增多的。每次戰爭中戰死的人數，每在戰後一二年內便完全恢復，特別是在一個破壞階段之後，必有一個復元階段，在那裏面生產率會昇至比常態的水平更高。拿破崙第一在顧盼着那滿佈死屍的戰場曾嘲弄地說巴黎的一夜天便可以完全補償起來。他的話自然是太狂妄誇大，可是在那時生產率的高度之下，像拿破崙那樣祇顧人口的數字，而不問人民的生命和痛苦的人，自然要以那種人口銳增的情形來爲自己用戰爭造成的破壞解嘲，並且預先計及將來的迅速的補償。

現在卻大不相同了。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中，死亡率差不多已達牠所能到的最低限度，以後不能再低。因此，在這些國家中死亡率的下降已日漸緩慢，有些竟顯呈不能再下降而成穩定的現象。別方面，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每年生產的人數則日漸趨於更迅速地減少，特別在最近數年間減少的趨勢更大。目前我們完全不能看見這一下落有停止的徵兆。這樣各西歐國家人口額數底自然的增加，即生產數之超過死亡數，正在一年一年更迅速地消滅下去。如此我們所看見的是

每年人口增加額的逐加減少，向着零數走去，其動向這樣地推進着，以致在不遠的將來這增加額竟將便為負數，即每年死亡人數較生產人數有系統地增多。關於這一動向請看下面的表格（註）

每千人口中生產率（B）死亡率（D）和自然增加率（N 即每年每千人中增加的人數。）

年 份	德			意			志			英			格			蘭			瑞			士			
	B	D	N	B	D	N	B	D	N	B	D	N	B	D	N	B	D	N	B	D	N	B	D	N	
一九〇一—一五	三四·三	一九·九	一四·四	二八·一	一六·一	一二·〇	二七·八	一七·五	一〇·三																
一九一—一三	二八·一	一六·三	一一·八	二四·一	一三·九	一〇·二	二三·八	一四·七	八·四																
一九二—一五	二三·一	一三·三	八·八	一九·九	一二·二	七·七	一九·四	一二·四	七·〇																
一九二六—一八	一八·八	一一·八	七·一	一七·一	一一·九	五·二	一七·六	一二·〇	五·六																
一九二九	一七·九	一二·六	五·三	一六·三	一三·四	一一·九	一七·二	一二·六	四·六																

因此西歐各國人口的數字在目前可知均有趨於固定的形態，而且在最近的將來或竟轉入絕對地減少的時代。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世界大戰在西歐人口中所造成缺陷將延長至數十年，

或甚至更長，因為我們已經看見在大戰期內關於生產率的「復元」程序已因現代生產率一般的常態的下落之故，成為無足重輕。我們的意見以為，再經過一次大戰爭之後，西歐人民將永遠不能恢復他們目前數字上的重要性。無論由於破壞階段後的復元階段中生產率之非常的上升，或由於戰後人民間常態的演進，均不能填補戰爭所造成的鉅大的裂痕。

法國的人口演進程序，一直均在其他各國的前面。牠的生產率首先降落，死亡率首先漸漸固定，其他各國的也正在趨向著牠所走的路走去。牠這樣一個人口率差不多沒有變動的國家，在世界大戰所受的影響正是一切這類國家的榜樣。一九二一年法國曾舉行人口總調查，其結果發現法蘭西民族的總數為三七、六六〇、〇〇〇，這比一八六六年的總數三八、〇八〇、〇〇〇還要少。我們在第一節已說過，法國人口從牠的數量上的重要性質看起來，簡直退後了六十年。除了施行一種移民進口和大規模的種族同化的政策之外，法國將永不會得到和戰前相等的民族人口額。這種情形不但是在法國，並且在一切人口額差不多固定不變的國家都會發現的。而現在所有的西歐國家，其人口演化的動向莫不是向這一固定的形態在走着。這種人口減少的趨勢在各方

面有些什麼影響，不必我們在這裏申說了。

十四 戰爭所造成的兩性間之不平衡

但是無論在那一方面看來，最重要的還不祇單在人口的數量，而更在人口的組合成分，其中特別應受注意的是兩性間和年齡各階段間的比較協調的和適當的分配。這對於一國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極端需要的。可是，正在關於這兩點上，戰爭特別地造成極深刻的紊亂。

我們大家都知道兩性間是沒有真正的平衡的。差不多每一歐洲國家內，男子的額數每略較女子為少。然而在平常時期中，也許可以說到兩性間相對的平衡（除了那些其人口常有大量的徙出或遷入的變動的國家之外，因為那些遷徙着的人民大都以男子居多。）比如在法國，大戰以前末次人口調查的結果發現每百名女子有九九·九男子（一九一一年），德國為一〇〇與九七·四之比（一九一〇年）。專就十五歲至五十九歲的人口而論，則法國為一〇〇比九七·七，德國為一〇〇比九八·〇。但是戰爭造成的直接死亡者完全屬於男子尤其是青年的成人，所以這種相對的平衡便完全被戰爭推翻。這樣在大戰以後人口總調查的結果遂發現每百名女子中

在法國於一九二一年祇有男子九〇·六，在德國於一九一九年祇有九一·〇。關於十五歲至五十九歲之間的人口則差異更大：法國為一〇〇比八九·五，德國為八八·二。這不曾說凡到每第九個女子便沒有男子來相配。^(註)

可是這一兩性間分配之差異，這種男子非常缺少的形勢，是按照人口的年齡範疇而各有不同的，下表可以顯明地表現出來：

(註)在所有各歐洲交戰國中，祇有意大利，因為一串奇特的環境連繫起來，使牠的人口中底兩性平衡率不但未被世界大戰破壞，而且反被直接地增進。在一九一一年牠的人口總調查表為每百女子比九六·四男子，而在一九二一年則為一〇〇比九九·一；十五歲至五十九歲的範疇內，在一九一一年為一〇〇女子比九二·三男子，到一二九年則為一〇〇比九四·四。這一特別的現象可以用移民的運動來解釋的，大戰之前，意大利遷出國外的人口比任何國家為多，因之成年和青年男子非常顯明地缺少。戰時移民出國狂流的完全停止，從前出國的人有許多重返故鄉，以及戰後美國和其他歐陸及海外國家所施行的取緝移民入境政策，尤其特別嚴厲地對於意大利人，使那些企圖遷出的也無可設法；這些原因合併起來使意大利戰後男子對女子的比率反較戰前加高。讀者欲知道詳細情形，請參考前註所引人口和罷工章三。

年齡	法國 (一九二一)	德國 (一九一九)	每百子女中男子女數
十五至十九歲	—	—	—
二十至二十四歲	—	—	—
二十五至二十九歲	八五·六	七九·二	九九·一
三十至三十九歲	七九·三	七四·四	—
四十至四十九歲	八三·九	八四·七	—
五十至五十九歲	九三·三	九五·〇	—
十五至五十九歲	八九·五	九三·六	—
	八八·二	—	—

在十五歲至十九歲的範疇內，因為男子未被戰爭屠滅，兩性間的平衡仍舊存在。從二十至六十歲的則大都均被破壞，其中以四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們間之差異尚比較為小，而二十至四十的範疇內則特別相差，可是在這一階段的成人羣中，兩性間的平衡卻正為特別重要，因此在這裏所引起的紊亂，自然更有特大的不良影響。我們再細看上表，當可發現其中的比率以二十五歲至三

十歲的爲最低。在法國男子祇占女子五分之四，德國更祇有四分之三。換一句話說，即在法國每五位女子中有一人沒有男子，在德國則每四位女子中即有一人沒有男子相配。(註) 在這種情形之下，其對於性道德和一般的道德之影響是不問而知的。同時從人口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方面看來，結果也不會優良。然而直到現在，還有人在那裏認真地講些什麼戰爭在道德方面的優良的影響！

這種被戰爭造成的人口中兩性間的不良分配狀態，自然不會隨着戰爭過去。在戰爭結束以後數十年牠仍將和惡毒的詛咒一般懸在全部人口之上，人民漸漸年老牠也漸漸消滅，直到那在戰爭停止時剛好二十歲的一代人們完全老死之後牠纔全部消滅。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在二十五年以內，交戰國必仍嚴重地感覺這種兩性間不平衡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必到戰事結束以後半世紀機會完全消滅。可是我們必須假定在這一期間內，那些有關的人們能够有充分的理智不再幹一次死亡的舞蹈。

(註) 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法國戰後的人口調查，是在一九二一年後舉行的，那時已經流入了許多從外國移來的客民，而戰爭所造成的關於性別和年齡的人口結構的紊亂狀態已因此而大為進步的。

十五 人口關於年齡方面的結構所受的擾亂——戰爭直接造成的損失

戰爭給與人口年齡方面結構底紊亂，主要地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戰爭直接造成的死亡率而起的，那完全祇影響到男性的成年人。第二類則主要地由戰爭的破壞階段中生產率之重大的低落而發生，牠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年齡結構都有影響。因為後者，戰爭對於人口的年齡結構比對於兩性間的平衡底影響還要深長。

因那些在戰場上喪命的兵士的死亡率而引起的年齡結構方面的紊亂，與上節我們所討論的兩性平衡方面的紊亂，有直接的關係。而且正是因為按照全部人口中各齡男女人數之比率，我們纔能把那很少人口移植運動的國家內人口在年齡平衡方面所受的擾亂很簡單，很正確的計算出來。比如，我們知道一國在平時各齡男女人數之比率差不多相等，即兩性間有相對的平衡，而在大戰以後，卻發現在各年齡範疇中男子人數不等地減少；如此，則前後兩期間的相差數即可以使我們很確切地知道，每一年齡範疇中男子被戰爭所屠殺的人數比率。在大戰的前夜德國和法國是差不多沒有人口向外移植的運動，所以我們可以按照第十四節中的附表計算出，這兩國每

一年齡範疇中成年和青年男子因大戰的直接死亡而遭受的相對的損失在這裏我們首先假定戰前各齡男女人數是相等的，即男子的比率無論在那一年齡範疇內均為一〇〇再從這裏而逐節減去第十四節附表中戰後每一年齡範疇內男子的比率。這樣我們得到每一年齡範疇中男子的損失百分數，有如下表：

年齡	法國（百分數）（註）	德國（百分數）
二〇至二四歲	一四·四	二〇·八
二五至二九歲	二〇·七	二五·六
三〇至三九歲	一六·一	一五·三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世界大戰屠滅了這兩國的二〇歲至二五歲（戰時約為十五至二十歲）男子總數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三〇至三九歲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的青年男子，在戰時約為二十至二十五歲的，所受損失最大，竟死去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註）參考前面註一關於法國戰後徙入的客民一點。

這一年齡結構方面紊亂的狀態，也不因戰爭結束而消滅。牠祇因時間的過去而漸漸減少，各級年齡上不平衡因人們漸漸老去而漸向上移動，直到曾參加戰爭的最年青的男子們完全老死後纔會完全消滅。

十六 人口的年齡結構所受的紊亂——因生產之突減而造成的損失

戰時破壞階段中生產率之突降，當然要大為減少這一階段中新生的人數，而使這一年齡範疇中男女人數均比較其他前後年齡範疇為少。開始時，自然是嬰兒名數特少，以後當這期產出的嬰兒漸漸長成時，這一年齡結構上的缺減便隨着移動，漸漸由童齡而青年而成年而老死，直到這階段內出世的人完全老死之後這缺減方消滅。不錯，在破壞階段出生率特別銳落之後，必隨著來到一個復元階段，在那裏生產率非常增高，以致前一年齡範疇內人數特別少，而後一範疇內反特別多。但是，第一、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因為現代西歐生產率常態的下落，復元階段在恢復生產率方面的效果甚微。第二、即使復元階段中有非常的增加，然而兩個相連的年齡階段中其一人數特別地少，而其二特別地多，並不是適當的現象，我們不能把兩者平均折算認為是和常態的相等的。

兩集體。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證來釋明：在破壞階段中新生的嬰兒名數特別減少，這在開始似乎不足慮的，然而到了六年至十三年以後，這時出世的嬰兒到了小學年齡，則小學生名數將大為缺乏。因之這數年中全國小學將差不多有一半空額，許多小學教師將被解雇，而新生的教師將找不到位置，引起教師職業中的危機。反之，復元階段，特別在那些常態的下落不甚顯著，而生產率在這階段中特別增高的國家，將引起相反的危機：班次中學生太多，學校不够，教師缺乏。這後一危機實在更加不易解決，因為這種形勢不過是暫時的，不足以作為增添小學校舍，聘請多額教員的根據。顯然地，如果沒有戰爭便沒有這種突然的減落與增高，而這種危機都不會發生。不但在這方面，在一切其他方面莫不是這樣。

破壞階段所造成的生產率底突然的降落，因而引起的人口常態結構上的紊亂，在許多方面均與戰場上的直接損失所造成的不同。第一、生產率的突降不但減少男性人口，也同樣地減少女性。所以牠並不影響兩性間的平衡，祇削減某一年齡範疇的數量上的力量。在別一方面，牠給與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影響較為長久。在至少四分之三世紀內，牠的影響仍可以直接地感覺到，直至戰

爭的破壞階段中出世的人口完全死盡為止。間接地，牠的影響更加延長，牠必定要影響到人口的變動和後一代的年齡結構。因在這時期產出的人口當達到壯年結婚時期的時候，必也特別地較平常為少，他們所產生子女數必定也少許多，因之下一代這一階段的人口在數量上也必非常地薄弱。這裏面的原因是因為女子數也同樣地減少，因之配偶亦少，對於將來的生產率以及人口年齡結構均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是將要不斷地一代一代延長下去，雖然日久之後會漸漸因各人年齡之不一而漸相調和。

以上我們所論尚是一般的情形。這種情形在世界大戰期間尤為可驚。因世界大戰範圍之廣大，牠在生產率上所引起變動是空前沒有的。從第三節附表中我們可以看見法國在一九一六年生產率祇及平時之半（九·五比一八·四），在德國則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等三年內都是如此（一九一六為一五·三，一九一七為一三·九，一九一八為一四·三，而戰前則為二七·二）。一般地說各國在整個破壞階段內的生產率都祇及戰前常態三分之二。如德國，在一九一九年曾舉行人口總調查，這種生產率之突然降落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影響可以顯明地看見。我們根據牠

的統計表發現德國全國人口每千名中五齡以下的兒童在：

一九一〇年為一二二名

一九一九年為六三名

一九二五年為八八名

在法國，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所舉行的總調查，表示出全國人口每千名中一九一六至一八年出世的兒童（到那時為二足歲至四足歲）祇有二七名，而一九一一的調查統計則紀載同年齡的兒童為每千人口中佔五二名。在意大利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的總調查，表現二足歲至四足歲的兒童（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出世的）在每千人口中佔四四名，而一九一一年的調查則為七二名。其他各國大都相類。這些都是各交戰國所受的既深且長的鉅傷。

十七 戰爭造成的解寡

我們所討論已經太長了，應該及早結束。但是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而且極應注意的，這是戰爭對於人口在家庭狀態上的結構底影響。這無論是從人口統計方面，或從道德的和社會的觀點

上一般的看來，都是很有意義的。因此，我們對於戰爭所造成的鳏夫與寡婦必要略為講幾句話。

大戰後各國所舉行的人口總調查多離開戰爭結束期甚遠。法國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英國在同年六月，意大利在十二月，總之都在停戰二年半至三年以後。關於德國，雖然一九一九年曾有調查，但關於家庭的情形，人口的性別和年齡等合併起來的完全的資料則祇有在一九二五年六月舉行的總調查中纔能充分得到，那時已在停戰七年之後。可是，從前面我們已知道密接戰後的一二年間婚姻率為特別地高，而寡婦和鳏夫們在戰時和戰後再結婚的亦非常之多，尤其是在戰爭結束後一二年。這樣，各國戰後的總調查中所記載的鳏寡人數當然不包括戰時造成的極重要的部分，即在總調查以前業已再婚的人數。如果我們把戰後人口調查中所紀錄的鳏夫寡婦的實數和對全人口的比率與戰前的記錄相比較，我們祇計算了那些在戰後婚姻狂熱的數年內未曾再結婚的人們。而且，因為還有別的可以想像得到的理由，使我們知道這樣的比較至多祇能使我們知道大戰所造成的新寡人口之大概約數，與實際相差甚遠。而且我們將祇察看那些在二十一至四十九歲之間的人們，因為在這一年齡範疇內的人們所受戰爭的影響最大。關於德國，因為我們

祇能利用一九二五年的調查結果，所以我們更能考察從二十五歲到四十九歲的人們關於綵夫方面，除了意大利因為我們在前面說過的理由，在大戰之後全國人口兩性間數量上的差異反而大為減少之外，其他各國戰後的名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比較戰前似有減少。比如德國在一九一〇年（舊領域）時，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的男性人口總數為一〇、三六一、五一〇，其中綵夫人數為一二九、六五七，或每千人中一二・五人；在一九二五年（新領域）時同年齡男子總數為一〇、一七三、〇九〇，綵夫為一二四、八一七名，或每千中一二・三。關於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我們所採的年齡根據是二十歲至四十九歲，其結果如下：

在英國，一九二一年這類年齡的男子總數比一九一一年增多，為七、七二八、一九八與七、五九六、九一七；而同年齡的綵夫名數則反減少，為一二二、〇五一比二二九、三五七，即由千分之一七減為千分之一六。法國同年齡男子一九二一年比一九一一年總數較少，後者為八、三八九、七一七（舊領域），前者為七、七四五、三四三（新領土），而綵夫數也從一九一一年的一六八、八八三減為一九二一年的一六〇、四八一，即由千分之二〇變為千分之二一。（這是在實數

上減少，但在比率上增加。）在意大利，同年齡男子從六、二〇七、〇〇八增加到七、三四二、〇四二；其鰥夫實數也從一一〇、三二五增加到一三七、六七五，即從每千人中一八人進為每千人中一九人。顯然地我們看見除意大利以外，各國的鰥夫名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微有減少，雖然大戰時平民的死亡率大為增高，其中包括多數女子。這並不是由於鰥夫人數在戰爭中反會實際減少，而是因為戰爭所造成的許多鰥夫業已在密接戰事結束後再行結婚。多數青年男子之在戰場死亡正好便宜了那些死了妻子的獨身者。

可是關於寡婦方面則完全相反。雖與多數鰥夫相同，在大戰結束後立有極多的寡婦重行結婚，然各國戰後的人口統計莫不呈顯全國寡婦數與戰前比較起來增加極多。在德國從二十五歲到四十九歲的寡婦數一九一〇年（舊領域）時為四六三、七九五至一九二五年（新領域）則增為六六六、六一五，即從同年齡女子每千人中四十四人增為每千人五十六人。其實際增多的名數在二十萬以上，比率增加百分之二七。在法國，二十歲至四十九歲的寡婦數在一九一一年為四五八、八六四，到一九二一則增至七一五、五三四，實際數字加多二十五萬以上，比率則增加百

分之四一八，從每千同齡女子中五十四人進爲每千中八十人。在英國，同年齡寡婦在同時期內從二七七、〇六九增至三九四、五九一，加多約十二萬；比率從每千人中三十三人進至每千人四十四人，或增加百分之三三·三。在意大利，一九一一年同齡寡婦數爲二九一、九三四，一九二一年爲四三九、七三四，實增約十五萬；比率由每千四十三進爲每千五十五，即增加百分之二八。這樣，在大戰後，雖有不少寡婦已再嫁，然各國均仍有鉅額的增加，從最少的十二萬起直到最多的二十五萬，而法國則居不值得企慕的第一位。

在以上所述的幾國內，所增多寡婦的年齡均以戰時在二十八至三十二歲的青年女子爲最多。在德國這類年齡的寡婦（一九二五年的人口統計表中她們爲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從每千人中三十八人增至每千人中六十五人，即增加二十七點或百分之七一。在英國，這類寡婦（一九二一年人口調查中屬於三十至三十四歲的範疇）從每千一九增至每千四十二，即增加二十三點或百分之二〇。在意大利，她們由每千三十增至每千五十九，即增加二十九點或百分之九七。在法國，一九二一年人口調查中三十歲至三十九歲的寡婦（她們在戰時爲二十八至三十七

歲）從一二八、八五七名增至二九五、三六〇名，從每千四十四加至每千九十八；其實數增加為一六七、〇〇〇，比率增加五十四點，即百分之二二三。

十八 將來的展望

以上我們已看見現代戰爭對人口變動上的主要影響。我們要再向前面展望，看未來的世界大戰會帶些什麼給我們，但我們不知道這樣一次將在何時爆發；即使我們能够推測那時間，我們仍不能知道那時我們的技術知識的情形，特別是關於破壞工具的能力，如化學和毒菌戰術的效果和其施用方法；我們更不知道在新戰爭時期國際公法關於戰爭的規條如何，及這種規條是否被遵守。這樣，我們實毫無方法可以推測，即或非常大概地，那將來的範圍極大的災變式的大戰爭將給與歐洲人口的影響為何如。然而，如果這未來的大戰也和過去的一樣延長至數年之久，我們可以說牠在人口統計上所造成的變化將更大於那過去的大戰，正和過去大戰比十九世紀幾次戰爭所造成的結果更為廣多一樣。在這一時代，當西方各國的人口正在趨於固定不變的形態時，當他們甚至於將發現自己的數量正在開始漸漸減少時，這樣一次大戰的意義，將不但各處地方

數千萬人底死亡，而是西方人口數字上的力量之不能挽救的減少，最後連他們所代表的文明都要腐化。也許這些國家現在所佔居的土地，將被代表別種文明的人口或甚至被其他種族殖民化。

在本篇中著者曾引證自著的關於現代戰爭，對於人口統計上的影響的書籍，其名稱如下：

戰時中立國家的死亡率。

戰爭與中立人民之婚姻率，見瑞士經濟與統計學報(*Journal de statistique et Rerrie Economic Suisse*, Berne, 1918)。

戰爭與流行性感冒，見日內瓦雜誌(*Rerrie de Genève*)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份。

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節錄自羅馬國際統計雜誌梅脫郎(*Metron*)，一九二五及一九二七，已出二卷。篇中一切數字凡未註明來源的，都係從有關係各國的正式統計刊物摘錄而來，或由著者根據正式刊物中的公佈消息計算得到。

14282

省

3.14
11
9
480-4
010645

學

